

# **I 希腊—罗马古典时代的哲学**

## 一、希腊的自然地理与早期历史

思想诞生于特定的历史环境之中，而历史又与自然环境——地貌、气候、物产资源等——息息相关。希腊地区位于巴尔干半岛的南端，东接受琴海，西邻爱奥尼亚海和亚得里亚海，海岸线曲折，岛屿密布，多良港。现代希腊（基本上包括了古希腊世界的核心地区）全国 75%的国土为山脉所覆盖，地形崎岖，只有 30%的土地可用于耕种。平原地区被山脉所分割，零散地坐落在高山和丘陵之间，古代陆路交通旅行在这样的条件下尤其困难，阻碍了各个山谷之间人们的交流，航海成了最方便的旅行方式。

希腊历史的大致分期如下：

新石器时代	7000BC - 3000BC
青铜时代	3000BC - 1200BC
黑暗时代/铁器时代	1200BC - 700BC
古风时代/赫西俄德时代	700BC - 480BC
古典时代	480BC - 323BC
希腊化时代	323BC - 30BC

约公元前 3650 年，爱琴海地区出现了克里特文明，这是古希腊地区最早的文明记录，克里特文明在约公元前 16 世纪时被迈锡尼文明取代。所谓黑暗时代，是由于根据考古学遗迹来看，不知出于何种原因，迈锡尼文明突然在约公元前 1100 年左右突然被“抹去”，希腊地区出现了普遍的衰败景象。在约公元前 750 年-前 700 年间，希腊社会在复元后走出了黑暗时代，大约在这一时候，著名的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形成，其理想化地描绘了公元前 8 世纪左右的希腊世界，所以黑暗时代的复兴时期（约 900BC-750BC）又被称为荷马时代，

荷马史诗或许可以与《诗经》相比较，不仅是诞生的时间相近，而且各自构成了希腊与华夏早期文明的重要文化背景。

希腊独特的城邦制社会及其文化，正是在黑暗时代孕育的，希腊社会的基本结构和制度在公元前 800 年已经确立成形，也是在这一时期，希腊社会脱离了黑暗时代进入了古风时代。现代人关于古风时期的文献资料多集中于诗人赫西俄德（约 750BC-约 700BC）的诗篇中，因而古风时代又被称为赫西俄德时期。古风时代是后来希腊鼎盛时期所取得的知识、文化及政治成就的关键形成期，诸多基础性架构被确立。希腊文明的诸多特征与当地的自然条件密不可分，可以说，地理因素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但随着文明的发展，即使外部因素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但或许是文明诞生早期所形成的传统，使得承续这一文明的后来者倾向于表现出类似的举动。古希腊时代的诸多特征（这些都有别于中华文明的历史发展），都可在西方后来的历史中找到不完全一致但又十分相似的对应。如公元前 8 世纪，由于对资源的需求以及国内可利用土地的减少，希腊人开始了持续近 200 年的海外大规模移民运动，最远到达了西班牙东部，不过这些殖民地与母城邦并不具有隶属关系。

一般来说，不将希腊列入最古老的文明之列，这不乏一些道理，不仅是时间上的先后问题，希腊文明的形成（主要指的是黑暗时期以后）是与周边文明接触学习的结果：天文学的知识是从巴比伦得来的，医学和几何学是从埃及得来的，希腊字母表的形成也与东方的频繁接触相关。这种外部影响的程度大小，或许还有待考量，但希腊地区作为文化交融荟萃之地，则无可怀疑。在希腊化时期以前，希腊地区最大的政治实体是一个个独立的城邦，城邦中又有不同的部落，当然也有不属于任何城邦的独立部落。在马其顿的统治之前，希腊从未曾有统一的记录，

但地理位置的接近，文化、习俗、语言与宗教的共享，使得希腊各城邦的人都有意识的认为自己同属于一个民族“Hellenes”（希腊人，来自神话的祖先“Hellen”），并在与东方（波斯帝国地区）的接触中，泛希腊化主义的理念更加清晰，希腊人更能意识到“我们”与“他们”的文化差异。

城邦的特质，近于《老子》中的“小国寡民”，与早期民主制度的建立之间，有着某种紧密的关系，在城邦中诞生的民主，是现代民主制度的先声。虽然民主推动了希腊城邦，特别是雅典的文化繁荣，但希腊的学者却未必都认同民主的理念。至少我们以现代人的眼光来看，希腊地区交融的文化与自由的社会氛围，是希腊之所以成为西方文明的“摇篮”的关键因素。为何西方哲学的传统不诞生于更古老的埃及或是巴比伦，至少有两点关键的因素，首先埃及或巴比伦的居民都未曾享有希腊人所享有的那种自由；其次，两河流域由于便利的地理位置，成为了诸多王国的交战之地，常年处在战争的混乱之中，这使得该地区更适合于希腊人眼中的专制国家，进一步限制了自由思想的出现。

## 二、前智者时期（前 585—前 5 世纪中叶）

### 1. 米利都学派

在荷马那里，虽然众神的影响依然显著，但已经暗示自然界中存在着一个严格的秩序。到赫西俄德来看，在传统神话框架的前提下，宇宙秩序的道德性已更加突出。在古风时代，来自米利都的学者泰勒斯完成了从宗教向哲学迈出的最后一步，他也是西方历史上第一个被记录的哲学家。将智者学派之前的哲学家命名为前智者时期或前苏格拉底时期其实都是有些不大公道的，他们同样做出了伟大的成就，这里不过是出于叙述的方便而沿用这一说法。泰勒斯出生于公元前 624 年，他没有任何著作流传，与他相关的信息都来自二手文献。尝试解释世界的那些问题或许并不是他最先提出的，但他在回答这些问题时首次不涉及神话人物，哲学的思考发端于此。

刚刚从早期宗教中诞生的希腊哲学研究范畴局限于自然哲学，这一时期科学与哲学是同一个东西，此时的学者一般的思想倾向为：认为自然是一种生命，可以自由活动（物活论）；认为哲学应是对事物本初的探究（本体论）；尝试以单一的理论诠释自然（一元论）；认为宇宙中所有问题能通过人类的思想解决（独断论）。总体而言，这段时期希腊哲学家层出不穷，提出了各种各样纷繁的命题与观点，互相抵触又相互影响，后世所争论的大多哲学问题，基本上可以追溯到这个时期。

泰勒斯的主要哲学观点为：水为世界最本初的元素；自然是有生命的，会活动、行动和变化的。泰勒斯的学生阿那克西曼德提出了万物源于无限、“世界轮回说”等概念；他的同伴，同样是来自米利都的阿那克西米尼试图沟通两个前辈的不同观点，并提出人类赖以生存的灵魂是一种气，世界也充盈着空气做出等学

说。米利都学派的主要贡献，在于首次提出事物的最终本性的问题，并尝试做出直接的回答。

## **2.毕达哥拉斯学派**

约公元前 580 年，毕达哥拉斯出生，他是杰出的数学家与哲学家，还是出色的天文学家，初步发展了古太阳中心说。

毕达哥拉斯对数学感兴趣似乎是由于宗教的原因。其所创立的毕达哥拉斯学派富有宗教的色彩，在数学的发展上有重要的影响，致力于以数学的方式思索世界的齐一性和规律性，以数为实体，将数看成万物的基质，认为一切事物的本初就是数。对数的这种理解，使得毕达哥拉斯学派形成了他们最重要的哲学观念——形式的概念。米利都学派已经形成了原初物质的观念，所有事物都是由它组成的，但特殊事物如何从原初物质中分化，他们还没有一个连贯的概念。在毕达哥拉斯学派这里，关键就是形式，形式意味着限定，而限定尤其要通过数来加以理解。

毕达哥拉斯学派最大的影响体现在柏拉图那里，包括灵魂和数学（几何）的重要性和形式或“理念”的概念，都为柏拉图所继承。

## **3.赫拉克利特**

在希腊哲学的早期发展中，永恒与变化逐渐成为一个思辩的焦点。赫拉克利特（约前 535—前 475）认为所有事物都是变化的，不朽是虚妄，并且无论是灵魂还是有机体，本质是火；整个世界的支配权一直掌握于斗争之中；世界的本质是不是火并不太重要，重要的是赫拉克利特认为宇宙的发展遵循一定的规则，并且宇宙的规律是统一的，这成为了后来大多数哲学家们试图证明或反证的重要问题。赫拉克利特认为运动背后的本质是普遍规律的理性，是逻各斯，万物的基质

是唯理的。

基于这种信念，赫拉克利特提出了这样的观点：对于所有有思想的人们，存在着一个可以到达的共同的宇宙，所有人都分享了神的普遍理性。这其实就是自然法的雏形，后来自然法的概念传到了斯多葛学派那里，并且直到今天，自然法也是法学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

赫拉克利特还是有意识地与世界疏离的洞察者的典型，哲学家的狂妄、冷傲的形象始于他。

#### **4.埃利亚学派**

与赫拉克利特的见解相反，埃利亚学派认为万物之基是恒久不变的。被迫认为埃利亚学派创始人的文学批评家与哲学家色诺芬尼（前 570—前 480）认为，神明是万物之基，是永恒的，是一切和太一。同时色诺芬尼已经认识到，不管上帝是不是真的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人，人却肯定是按照自己的形象造神的。

埃利亚学派的真正创办者是巴门尼德，他是赫拉克利特的同代人，约出生于前 510 年，他的一生大部分时间是在埃利亚度过的。在巴门尼德看来，一切的实际存在是一种本初的、连续的、不变的、永恒的、理性的、非确定性的球形质料，他最重要的影响或许是提出了哲学思考的新维度：对认识的主体“意识”进行反思，区分了“真实”的世界与感官知觉的世界。

巴门尼德最重要的学生是芝诺（约前 490—前 430），为了替自己的老师辩护，他将自己的论证构造成悖论的形式，提出了著名的否定运动的“芝诺悖论”。芝诺强烈地感到我们的感官没有为我们提供关于实在的任何线索，它只是为我们提供了关于现象的线索。这一非凡的创见与后来康德的思考不无相关之处，再一次印证了希腊的哲学家们已提供了西方哲学史上的大多数思考的原型。尽管芝诺

的尝试具有极大的冲击力，但终究无法与人们关于世界的常识相符合，促使着后来的哲学家们以一种不同的方式解决变化与恒常的问题。

### **5.恩培多克勒与阿纳克萨哥拉**

出生于前 495 年的恩培多克勒则判断，创生和衰亡都不存在，事物间最基础的关系是分散和聚合，世间最基础的物质是土、水、火、气（四元素说）。他的这些思想是对其前辈观点的重新整合。其四元素的说法，即构成世间万物的是四种永恒不变的微粒，已经具有了原子论的原型。受到受俄耳甫斯教和毕达哥拉斯学派影响，恩培多克勒也信奉灵魂转世，他因此将杀害动物视为谋杀，成为了素食主义的热烈辩护者。而毕达哥拉斯学派也是西方素食主义的早期提倡者。

而阿纳克萨哥拉（前 500—前 428）认为万物的元素并非四种，且其自然生成，恒常不变，无限小，却可分割；阿纳克萨哥拉的主要贡献是提出了心灵的概念：宇宙诞生于最本初的旋转运动，是在心灵本源——独一无二的基质——推动下形成的。虽然他把心灵作为宇宙中和人的身体中的推动力，但其对心灵实际作用的解释有局限，物质的创造者和自然世界的任何目的都未被提及。但他区分心灵和物质的尝试将一种抽象的原则引入了关于事物本质的思考之中，在后世产生巨大影响。

### **6.德谟克利特与原子论**

恩培多克勒和阿纳克萨哥拉为宇宙的自然科学观点开辟了道路，影响了原子论的诞生。原子论由留基伯提出，并由他的学生德谟克利特（约前 460—约前 370）完善。原子论在认同埃利亚学派世间不存在绝对的变化的基础上提出，但同时留基伯也是为了反对埃利亚学派对空间或虚空的处理方式。构成世界的原始基质是恒常不变的原子，原子无法分割、无法渗透，是最简单的物质单元，所有



的原子本质上是相同的。原子论将世间万物都机械地还原为原子，可以视为最初的机械论。在科学上，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说要比道尔顿在十九世纪初建立现代原子论之前的任何学说更接近于现代的观点。

除了描述自然的结构，德谟克利特还关注知识问题和人类行为问题。他是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认为原子的运动也可以用来解释思想。德谟克利特区分了感性知觉和理性知觉，都是物理过程。在他看来，感觉和思想都是同类型机械式的过程。关于人类行为问题，即伦理学领域，德谟克利特的观点与后看来的伊壁鸠鲁主义有些类似，主张合适的方式来追求快乐。在德谟克利特之前，哲学家主要关注的是自然领域——物质世界的构成及其发展，之后伦理学及人类在相互关系以及社会组织中的作用逐渐成为哲学最关注的问题。

### 三、希腊的古典时代与智者运动

#### 1. 古典时代的希腊

希腊诸城邦中最强大也是最有影响力的是雅典和斯巴达，至今仍能为大众所熟知，但今天我们试图了解斯巴达，却往往要依靠；来自于其长时间的对手——雅典的带有偏见的文献资料。虽然希腊的文化重镇并不止雅典一家，上面所提及的那些早期的哲学家们也大都不生活在雅典。但随着古典时代的到来，雅典成为了希腊文化最辉煌的城邦，雅典的文化及其民主制度，成为了那个时代留给我们的最璀璨的文明成果。古希腊最著名的三位哲学家，苏格拉底、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即长时间生活在雅典。

在古风时代以后，相当长时间内，古希腊人最有威胁性的对手，是居鲁士大帝（前 559-前 530 在位）所创立的波斯帝国，希腊人并没有像称呼其他外族人那样把波斯人称为“野蛮人”，反而对他们在政治以及艺术上的成就表示推崇。虽然大部分希腊人并不欣赏波斯的“东方专制主义”，在他们看来波斯帝王的臣民不过是其奴隶而已。波斯人对希腊的首次入侵发生在大流士（前 522-前 486 在位）时期，波斯的入侵行动中令希腊诸城邦团结在一起，但在与波斯人和平相处的时候，希腊城邦间却政治纷争不断，波斯人此时则会通过资金援助等方式离间并削弱各希腊城邦。但在薛西斯于公元前 479 年入侵希腊失败后，波斯再未对希腊发动大规模的战争，这一年可视为古典时代的开端。

在波斯战争之后的数十年间，希腊的文化与政治成就都达到了一个显著的顶峰，后者的突出代表是伯里克利（约前 495-前 429），在他治理下的雅典进入了早期民主制度的高峰与最辉煌的时期，但是峰顶意味着随之而来的下降。不久以后希腊便陷入了以雅典和斯巴达为首的两个城邦同盟间的激烈内战，伯罗奔尼撒

战争（前 431-前 403）虽未毁灭希腊世界，但严重地削弱了它，城邦内部陷入了分裂与经济的衰退。正是在这时，希腊世界边缘的马其顿在菲利普二世（前 359-前 336 在位）的统治下成功征服了希腊，而其子亚历山大则通过奇迹般的征服开启了希腊化时代的历史。

## **2.智者运动**

希腊人对自然的认识取得重大的进展之后，旧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发生了深远而明显的变化，各个思想领域都受到了自由研究精神的感染，新的思想渐次取代了旧的思想，构成了古典时期希腊的伟大遗产。其中如埃斯库罗斯（前 525-前 456）、索福克利斯（前 496-前 405）、欧里庇得斯（前 480-前 406）在戏剧诗中对人生和宗教进行了更加纵深的思考；历史学研究中，希罗多德（生于前 480）开辟了以批判角度研究历史的道路，修昔底德（生于前 471）则为批判历史主义代表人物；医学领域，哲学领域的物理理论被渐次应用，医学的发展也促进了哲学的研究，其中著名的人物是希波克拉底（生于前 460 年）。应用领域快速发展的同时，希腊哲学思想体系陷入了一种短暂的停滞。这一时期可视为一段启蒙时代，独立自主的思索成为一种倾向，对自然科学和哲学的研究成为焦点，众多条件都在有利于人们思想的发展。

与此同时，个人主义蓬勃生长，希腊社会因过度个人主义、怀疑精神而陷入否定的思潮，旧的权威无法束缚个人，怀疑主义蔚然成风，甚至，自私自利的信条成为人们赞美与颂扬的对象。正是在此时，希腊进入了智者运动时期。

智者运动（又称诡辩派运动）的发生，有两个重要的背景。一是古希腊早期教育的偶然性与非正式性，偏向于贵族和文艺。自荷马时代以来，希腊城邦一直没有创立公共学校，儿童主要是通过观察周遭世界以及模仿德高望重的长者来学

习的，“书本知识”只扮演了微不足道的角色，学习的主要形式是两个或多个个人之间的互动。因此那些积极参与城邦生活或是本身具有较高地位的家族，在希腊教育活动中，占据了显著的优势。第二，随着雅典的民主制度在古典时期越来越受到希腊知识分子的欢迎，民主所需要的演讲与说理技能，成为了希腊人的迫切需求，传统的家庭式教育已不足以满足民主社会生活的新情况。于是，以教授修辞学、公开辩说技巧为生的智者派应运而生。

智者，又称诡辩家、智辩家，他们既是教师又是某种概念的哲学家，在希腊世界各处行走，通过收取学费教导辩论术与思维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智者将先前哲学家们的思想在希腊世界中传播开来。关于智者运动的研究最大的问题在于相关观点介绍的来源并不十分可靠，最早的资料来自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作品的只言片语，尚未发现明确的智者学派的作品。

智者派最初的声誉无疑是好的，但是修辞学本身既可以为善，也可为恶。似乎没有多久，智者派的怀疑主义和相对主义（这些正是高超的辩论术所需要的）使他们受到怀疑。而智者派所收取的高昂的学费，也偏离了早期哲学家那种不带任何经济考虑而从事哲学的思想家形象。由于

### **3. 普罗泰戈拉**

智者学派中，最有影响力的是来自阿布德拉的普罗泰戈拉（约前 490-前 420），他的以下教导广为人知，“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者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者不存在的尺度”。

智者学派突出的怀疑主义和相对主义在普罗泰戈拉身上极具有代表性，他认为“我们通过自己各种各样的感官知觉到的对象必定具有不同的人各自知觉到的属于它们的所有属性”。当谈到伦理学时，普罗泰戈拉认为道德判断也是相对的。

类似这样的态度使得许多希腊人认为，智者派恣意无度地利用修辞进行诡辩。任何事物既不是完全的善，又不是明显的恶，如此的精神宇宙并不是所有希腊人都想栖息的。

不过有趣又巧合的是，就像休谟一样，在普罗泰戈拉带有激进色彩哲学观念背后，却是他相对保守主义的结论，年轻人应该被教育接受和支持自己的社会的传统，这不是因为此传统是正确的，而是因为它使一个稳定的社会成为可能。智者学派在后期逐渐使自己招致强烈的公愤，大概也是出于对普罗泰戈拉谨慎看法的背离，进入了相对主义的极端境地。

#### **4.智者运动的评价**

智者运动或许可以视为在旧思想与新思想的转换期间出现的一稍显过激的反应，是两个伟大的思想时代的桥梁。智者运动的积极意义，在于其提出了“人”的重要性，要求道德、哲学、宗教、习俗以及建立在其之上的制度都为自己存在的合理性进行说明，有别于前智者时期只对自然的关注。同时随着希腊古典时代的到来，社会经济、民主政治的发展，带来了对文化知识的普遍需求。智者学派顺时改变了希腊的教育，人类的知识得到了古风时代以来最广泛的一次传播。

但智者的错误，则是没有对理性这一工具进行建设性的应用，遗忘了对智慧本身进行批判，其在教授知识时收取的高昂学费也为人诟病。智者运动的诸多不良行为，助长了这一时期的混乱的道德状态，亟需有人对时代的思想进行整肃。

## 四、苏格拉底时期

### 1. 苏格拉底

在智者运动后期诞生的苏格拉底（前 469-前 399）常被认为最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史上最负盛名的人物，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苏格拉底未留下任何著作，其思想和生平记录于柏拉图和色诺芬的作品中。因此究竟哪些哲学思想可以确认是苏格拉底本人的，现在还是有争议的。苏格拉底思想的背景主要是承续着智者学派的影响，而不是希腊早期前智者学派的哲学家们，这一事实反映了希腊哲学关注的重心已落到了伦理学以及人类活动的领域。苏格拉底的一生致力于反驳智者学派的观点，认为他们是在挖掘知识的墙角，是对国家基础与道德根基的毁坏。他坚定的认为，这个时代所遭遇的种种困境都能被理性解决。他并不致力于创造一个思想体系，他更关注的是知识获取法本身，帮助人类矫正思维，激发对真理和德性的爱。他也从不讨论诸如宇宙性质的玄妙问题，拒绝对宇宙秩序的根本原因和天体现象进行探索，他更热衷于从实际应用方面来考虑问题。

亚里士多德将普遍的定义和归纳推理的方法归功于苏格拉底。正是通过归纳推理的方法，苏格拉底得到了普遍的定义，这一方法又被称为诘问法或称苏格拉底教学法：以反复追问的巧妙方式来从对立的看法中提取普遍认可的判断，成为一种经典的辩证技巧。苏格拉底也将自己形容为心灵的助产士，帮助他人培育正确的哲学思想。

苏格拉底认为人类的确拥有某些美德，人应当追寻德性。他一直致力于寻找道德的真正意义，何为善，何又为至善？而他所给出的解答是，至善就是知识，一个人若是知道何为德性，那么德性将为他所拥有。在前智者学派的哲学家那里，

智识或理性主要被用于探索自然、万物的本源；智者学派在苏格拉底看来，显然滥用了理性，陷入了今天我们所熟知的“后现代主义”类似的境地；苏格拉底把知识同德性等同起来，智识主义或许就是在苏格拉底及其弟子那里，开始在西方哲学的传统中站稳了脚跟。

苏格拉底把一生大部分的时间都用来审视自己的生活和其他雅典人的生活 and 思想上，在雅典的经济和军事还强大的时候，苏格拉底还能随其所好地追问而不受惩罚。但当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遭受严重的挫折，社会大势不可逆转地走向危机和挫折，苏格拉底也开始被视为危险性的人物，一些雅典人将战争的失利怪罪于苏格拉底对道德习俗、宗教和政治行为的刨根究底。而苏格拉底学生阿尔希比亚德斯的叛国行为等与战争有关的一系列事件最终导致了对苏格拉底的审判。在法庭上，苏格拉底对自己无罪的坚信使得陪审团在他的傲慢面前颜面扫地，最后判处他死刑。有机会逃跑的苏格拉底服从了法庭的判决，以示对雅典制度的尊重，践行了自己对真理的信念。

人们有时会将苏格拉底与孔子（前 551-前 479）相比较，关注其间的相似性，表彰两人各自对东西哲学传统的重要地位。这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但其间却又重大的差异，不可不辨。其一，孔子是中国“轴心”时代第一位哲学家，孔子开启了诸子百家的思想争鸣，而苏格拉底活跃于古希腊哲学传统的中段；其二，两人的思想都体现了对教育的重视，但孔子揭橥了从西周王官学到平民教育的百家言的转变，而苏格拉底的教育则是对智者学派的修正；其三，孔子传统中被视为东周以前中华文化的整理者，集殷周学术思想之大成，而在希腊传统中的这一工作要等到亚里士多德那里完成。最后接续苏格拉底传统的亚里士多德成为了西方哲学文艺复兴以前最大的权威，再考虑到确为孔子的作品名录亦富有争议，将

苏格拉底与孔子相提并论也未尝不可，但在古代中国的语境下，孔子的地位显然更类似于亚里士多德。

回到希腊哲学的发展中，苏格拉底的思想并未形成系统的思辨体系，也没有为行为及认识提供相应的理论论断，这将留给他的弟子们以他的思想为基础创立与完善。

## 2. 柏拉图

柏拉图（前 427-前 347），是苏格拉底最著名的弟子，创立起一个完整的哲学体系，并创建了认识论、行为论、国家论和宇宙论。老师苏格拉底被判死刑使得柏拉图受到了极大震撼，年轻的他离开雅典前往希腊世界各地游历，但最后他还是回到了雅典，并于前 387 年创建了学园，在某种意义上这是欧洲历史上的第一所大学。

在柏拉图之前，思想家们大都只关注单个的重大问题，柏拉图首先把希腊人思想所关注的主要问题都综合进了一个连贯的知识体系中。柏拉图也对之前的希腊思想家们的理论进行了继承，他赞同只有与概念相关的知识才是真正的知识（苏格拉底）；认为现象世界是不断地变化的（赫拉克利特），同时认为理念世界是恒常不变的，一即存在（埃利亚学派）；认同存在是多理念（原子论者）；物质与精神存在差异，精神占据统治地位（阿纳克萨哥拉）；他对绝大多数的希腊思想的理念表示赞同，宇宙是一个存在理性的整体。

柏拉图哲学的基础是其对知识的论述，在苏格拉底反驳智者学派的基础上，柏拉图确信存在着人类理性可以把握的不变的普遍真理。柏拉图重视辩证法，在他看来，辩证法的意义在于将散乱的、个别的事物以一个理性的概念进行概括，从一个概念到另一概念，直到最后掌握至高观念——第一原则，从这个角度来



看，柏拉图的辩证法类似于一种归纳法。柏拉图认为，实际与思维之间存在一致性，这种一致性就是知识。而概念的知识才是真正的知识，且是恒常不变的。

柏拉图的理念论是他自有影响力的哲学成就。在他看来，理念与模式具有实体性，是自在的，自我作为的；它们是一种实际存在的物体，是万物本初、不朽的、超凡的、有序的原始模型，先于事物而存在，脱离事物而存在，变化不能对它们造成影响。简言之，理念是那些不变的、永恒的、非物质的本质或原型，人们所看见的事物只是这些原型的拙劣的摹本。以理念构成的宇宙是井然的，深具理性的。各种概念与模型彼此连接为一个有机整体，以至善为最高理念，宇宙的目的为逻各斯，逻各斯为至善。如毕达哥拉斯一样，柏拉图也重视数学，尤其是几何学，他的宇宙观基本上是一种数学的宇宙观，据说柏拉图创立的雅典学院大门上便写着“不通几何者勿入此门”。

包括柏拉图在内的许多哲学家都曾研究过心理学，核心的概念是“灵魂”，他们的论断往往带有显著的独断论性质，仅作为完整、试图逻辑自治的哲学体系的一环而存在，严谨、可实用、独立的心理学要等到 19 世纪才出现。

或许受到了早年经历的影响，柏拉图并不认可民主政治理念（至少是当时的大众民主），他的理想是一个由“哲学王”领导的分等级的共和国，是君主政体与贵族政体的综合。历史上有记载的，最接近柏拉图理念的国家或许是新加坡。柏拉图的注意力也在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之外，分享给了自然科学。不过科学的发展在柏拉图的时代已经走入迷途，柏拉图所构建的宇宙论图景十分勉强，柏拉图自己也说他对物质世界的解释只是“姑妄言之的说法”。在讨论中，柏拉图首次引入了“目的论”的观念，认为任何物理现象的解释必须是目的论的，即要达到某个目的，目的论最后在黑格尔和马克思那里登峰造极。

总的来说，在柏拉图构建的哲学体系中，知识是唯理的，感官知觉并非知识的来源，即柏拉图坚持唯理主义；其对实在的世界表示认可，它的确存在，他坚持实在主义；世界本身就是精神的，存在于理想之中，即唯心主义为他所支持；感官所感觉的世界是真实世界的投影、表象，柏拉图哲学又是现象主义的；柏拉图还坚持泛神论、超验论、内在论，支持目的论，反对机械主义；他以物质与精神两种最原始的质料诠释世界，即二元论；在政治上，柏拉图的期望为构建哲学王的“理想国”，带有社会主义与精英主义色彩。希腊哲学直到此时，虽然柏拉图的体系中仍存在着一些需要被思考的矛盾与困难，但无论如何，柏拉图所构建的思想体系无疑是最成熟的，他所铸造的模式具有强大的影响力，那些哲学史上诸多重大的问题首次被综合性地回答。以学术的“内在理路”来看，学术思想变迁的自主性已在柏拉图这里具备，无怪乎怀特海会说“一部西方哲学史是对于柏拉图的一系列的注脚。”

### **3.亚里士多德**

作为柏拉图最有成就的弟子，亚里士多德（前 384-前 322）并未全盘接受老师的哲学体系，他也未继承雅典学院，而是开创了自己的逍遥学派。亚里士多德被认为是西方多门学科的开创者，是古典时代希腊哲学的集大成者，也是文艺复兴以前，西方学术领域的最大权威。

亚里士多德整理了他前辈的学说，今天我们读到的关于早期希腊哲学家思想的一手资料（或者说二手，因为亚里士多德也只是整理并加以评注）许多都来自亚里士多德的著作，而这些前辈们的原著都已经遗失。

亚里士多德重视逻辑，将之称为哲学的“科学”，其宗旨为对思维的方式、思维的内容及知识的获取过程分析，形式逻辑便是亚里士多德发明的。亚里士多

德的逻辑研究的重要成果，包括：三段论式，由普遍推演出特殊的方法，这是亚里士多德逻辑系统的基础；调和经验主义与唯理主义的归纳法；范畴的概念，即囊括某种最具有概括性的谓语，能够诠释任一事物的最普遍、基础的形式。他应用了分类的方法，对科学（那时也可以说是哲学，自然哲学）进行了细致的划分，分为包括物理学、生物学、天文学、应用哲学（伦理学、政治学等）及形而上学，并对它们都进行了相当深入的研究。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获取知识的真正方法是弄清它们所以必然这般的因由、根源与本因，所有由理性思索而得的知识包蕴在哲学。他首次对事物的本因或者根源进行研究的哲学进行了命名，称其为“太初哲学”，后人名之为形而上学。在 19 世纪的经验主义者或实证主义者那里，“形而上学”被视为没有事实基础的信念的代名词，这种歧见是偏激而荒谬的。不仅形而上学在亚里士多德这里是严肃、合理的，并且对形而上学的研究或信念深刻影响了科学的进步，我们将会在今后的讨论中继续这个话题。

亚里士多德在柏拉图“思维与存在是同一的”、“宇宙是一个有机整体，彼此相互联结，存在于理想之中，是一个理念的体系，恒常不变”的唯心主义观点基础上，认为理念与感官感知的世界并未脱离，而是感知世界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世界的形式与生命是理念赋予的。没有任何性质能脱离它所在的对象单独存在，物质不存，形式便也不存，反之亦然。追根溯底，本初的因由只有两个：物质与形式。而实体是形式与物质的结合。运动中，扮演推动角色的是理念，被推动的是物质。在他看来，物质层面恒常的运动被某种恒常不动的存在推动，即有一个一切的最初的推动者，是绝对的精神、单纯的理念。最初的因由是至善，是世界的终极目的和最高目标。但亚里士多德不认同柏拉图关于普遍先于特殊而存在的

说法，也不相信柏拉图的理念论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事物。

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在希腊思想史上首次具有相当的科学性与广博性，其目的是为了追求至善，在他看来，有德性的生活是一种富有理性的生活，需要始终坚持唯理的态度。而唯理之态度是中道，是位处两种极端之间的一种中庸，但在具体讨论时，亚里士多德总会放弃这一原则，认为其不适用。在这里我们似乎看到了亚里士多德思想中与中国“中庸”的类似之处，但亚里士多德最终并未运用这一原理的举动也反映了东西文化取向的差异。

有观点认为亚里士多德最先将伦理学与政治学进行区分，他的政治理论认为部分的存在迟于整体，国家的存在高于家庭、公社和个人。像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他也对民主政治提出质疑，并倾向于精英主义。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也有相当保守的地方，例如他认为女人和奴隶的本性都不可改变，尝试通过论证奴隶没有理性来为希腊社会的奴隶制辩护，在这里我们应该抛弃斯大林“五阶段论”的机械观点，我们可以看到，奴隶制从希腊、罗马到南北战争前的美国，都曾在社会经济中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与此相对照的是中国，自东周以下，奴隶制或类似的制度在经济中始终未曾占据重要的位置。

#### **4. 希腊早期科学的回顾**

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早期希腊哲学家关于科学的基础知识最初大部分是从外部得到的：他们的天文学是从巴比伦尼亚得来的，他们的医学和几何学是从埃及得来的，可能一部分是通过克里特岛。这些构成了希腊科学的早期背景。我们接下来要做的，是以现代科学为标准，考察希腊人的科学成就，以及他们的哲学思想对后续哲学发展的影响。

在这里“科学”一词的用法具有相当大的模糊性，我们有必要对此做出一定

的澄清。首先，科学一定不是单纯指对自然现象的研究及解释，不然宗教的诠释或巫术的诠释也是对自然现象的一种理解，但却显然不是科学的。如果按照今天的标准，科学的目的是为了发现真理，依照一套“科学的方法”所作出的解释就被认为是“科学”的。而“科学的方法”并非一成不变，科学寻求对世界最好的解释，当新的方法足以被证明是更有说服力时，科学的方法随之改变，并没有一种简单、不变的，可被孤立地运用的科学方法。由于现代科学所实现的巨大成就，在公众中甚至部分学者那里，“科学”一词被当成了“正确”的逻辑等价，我们暂不提其他场景的运用，只限于自然科学的研究，这种用法也是错误的。科学的方法可能带来错误的结论，只要在被推翻后得到修正，不执拗于已有的成见，我们也可以说这个错误不是“非科学”的。这一点在我们回头去考察古人，特别是近代科学革命以前的思想家的科学成果时，特别值得注意。我们当然可以以科学界最新的共识作为基准，去评判古人的成就大小，却不能单纯以是否符合或接近现代观点而做出否定。我们应该对先辈的非凡的智慧保持尊敬与理解，但也不必因为某些古代学者提出的理论刚好符合今人的认知，就断然否定那些同时代持有相反意见的人，毕竟在那样的时期，科学的方法很不健全，系统、可靠的论证手段未曾发明，那些被认为做出正确结论的人相当程度上依靠也是歪打正着的运气，而以同时代的眼光来看，做出“错误”的学者未必不符合当时的“科学方法”。我们可以指出古人与今人的差距，以及错误所造成的后果，但却不必过分苛责。

希腊人在科学上的杰出成果主要涉及三个领域：数学、医学与物理学。数学的贡献主要是毕达哥拉斯学派以及希腊化时代的欧几里得做出的，前者为世间万物赋予了数学和谐的理念，影响了哥白尼的日心说模型的提出，后者则通过对几何学的研究，提出了一套完整的公理化体系。希腊的医学在希波克拉底那里达到

顶峰，虽然我们今天不会再同意他那一套四体液平衡的学说，但通过盖伦（129-200）的改进，希波克拉底与盖伦的见解成为支配欧洲近一千多年的医学理论。

物理学与哲学的关系最为密切，物理学在自然科学研究中的影响也最大，近代科学的方法正是肇始于物理学及天文学的领域。前面已经提到，古希腊人在物理学上最接近现代的观点是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学说，但很不幸的是，德谟克利特的作品全部失传了，今天我们关于他的论述都来自于亚里士多德。但亚里士多德除了不承认有空无所有的空间外，也拒绝了与原子说有关的一切概念。事实上，亚里士多德关于科学的看法和结论在西罗马帝国的灭亡后，成为了统治者西方世界思想的唯一权威（除了基督徒的《圣经》以及穆斯林的《可兰经》），我们应当仔细分析一下亚里士多德的世界观。

## **5.亚里士多德的科学观**

亚里士多德当然在科学上做出了很多贡献，比如发展了对动物的较为合理的分类系统、创立了形式逻辑并仔细研究了三段论，同时也做出了今天看来显然错误的判断，包括上述的拒绝原子论以及认为地球是宇宙的中心。不过我们这里主要关注的是亚里士多德关于科学或自然哲学的一般看法，这构成了中世纪所谓的“亚里士多德世界观”，是思考物理实在的本质和从事科学研究的权威和制度化了的框架。

对于亚里士多德和大多数希腊人来说，有着“自然哲学”和“技术科学”的区分，前者是包罗万象的、系统的理论的哲学，上文所说的物理学、数学就属于这一类。而后者则是探究自然的狭窄的、技术性的、专业的领域，更不被希腊思想家所重视。

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宇宙是整齐、和谐的，一切都有自己的自然位置，“自然运动”还原自然位置，“受力运动”是人为施加的，是非自然的。这导出了一个结论：亚里士多德的“自然哲学”是研究自然事物的本来面目的，与人类技术等“技术科学”无重要的关系。因此，实验的科学被忽视了。比起亚里士多德对原子说的拒绝，这一方向性的错误对科学的进步阻碍最为严重。哥白尼与伽利略对科学的贡献，即建立在打破亚里士多德宇宙观的基础之上。

近代科学诞生之初，新时代的哲学家对亚里士多德的批评极为尖锐，除了指出他的科学观的谬误外，弗朗西斯·培根也抨击其三段论对实验科学毫无用处，也不能推出什么新的知识。一下子亚里士多德好像从科学的权威突然就变成了科学的罪人。当然，我们现在可以更坦然地认识到亚里士多德的伟大成就与受时代于个人所限的不足。但亚里士多德不过像他的前辈那样提出自己的见解，却不未曾料想被后人当成为了不易之论。

## 五、希腊化时期

### 1. 亚历山大帝国

从多种方面来看，亚历山大（前 356-前 323）的成功都是一次在各种巧合因素作用下的极小概率事件，在其父亲菲利普二世的治下，位于希腊世界北部的马其顿成为了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的王国并成功地征服了希腊诸邦。自古风时代以来，希腊前所未有的统一，除了伯罗奔尼撒战争从内部瓦解了希腊城邦的经济、军事与相互之间的信任外，许多身处动荡之中的希腊人也开始期望发生巨大的变革以整顿希腊的各种弊病——或是君主专制，或是一场对外的圣战，这与公元前 5 世纪希腊人认为的专制政府与好政府截然对立的想法判若云泥。最早提出这样意见的人是雅典的讲演家伊索克拉底（前 436-前 338），他与一些希腊人渴望有一位能够挽救希腊的铁腕人物，能够团结希腊人发动一场圣战，抵抗波斯的堕落统治。

这一时候波斯宫苑中豪华糜烂的生活已经把居鲁士和大流士一世时代的勇武豪情和战斗精神消磨净尽。时任波斯国王的大流士三世的军队虽然看似豪华壮观，连军官的马鞍和马镫也都是黄金铸造，却在没有实战经验的大流士三世的亲自指挥、亲自部署下，面对亚历山大人数虽少但精悍强健的正规军不堪一击。仅仅在伊苏斯和古卡摩尔两次大型会战后，历时 210 年的阿契美尼德王朝在公元前 330 年宣告终结。

亚历山大的帝国也许并没有改变历史的进程（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即使其帝国在亚历山大与前 323 年身死后迅速走向解体，诸继业者王国的统治者——亚历山大的将军们——都接受并积极推广古典希腊的文化，使希腊文化在地中海东部地区的传播得到了显著地加速，这大概是亚历山大最大的贡献所在。



这一阶段是希腊文化产生广泛影响的时期，虽然创造性的成果不如古典时代的希腊涌现得那么密集，但毫无疑问，后来罗马与希腊文化的相遇，继而缔造了古典西方留给欧洲最令人念念不忘的政治遗产，必然要上溯到希腊化时期的影响。

在亚历山大的继承者中，托勒密王朝统治下的埃及成为了希腊世界的重要枢纽，因为当时希腊学术的中心，就在埃及的首都亚历山大里亚——亚历山大最闻名于世、影响最为深远的根据地。托勒密王朝对扩大图书馆馆藏的热情，为各个领域的学者们提供了史无前例的学术研究资源。尽管雅典仍旧是知识分子向往的地方，但希腊化时期哲学思辨的中心不仅从雅典而且从希腊本土转移出去。比如，最著名的斯多葛哲学家来自诸如塞浦路斯和叙利亚等地，而最负盛名的斯多葛大学城则是塔尔苏斯、亚历山大里亚和罗得岛。

在亚里士多德完成了古代西方最宏大的思辨体系之后，伦理学的知识尚未具备完善性与充足的可实践性，伦理问题仍需进行讨论。当希腊化的政权初步建立后，此时的西方世界旧制度面临崩坏，公众生活败乱，伦理问题迫在眉睫，这就留给亚里士多德之后的哲学流派着手解决。这些流派也对形而上学的知识有所贡献，但最主要的贡献还是在伦理学及政治学领域。实践的哲学成为了新的重心。

## **2.犬儒学派**

犬儒学派由苏格拉底的弟子安提西尼（出生于约前 447）创立，安提西尼晚年对哲学丧失信心，抛弃上层的生活方式，希望回到原始社会。关于学派名称的来源，说法不一，其中一种为安提西尼曾在名为“快犬”的运动场演讲而得名。犬儒学派以“德性自足”为终极目标，强调独立精神和坚韧的培养，摒除一切奢侈和舒适，以及文明带来的奇技淫巧，忍受饥饿与侮辱。犬儒学者相信真正的幸福并非建立与稍纵即逝的外部环境，每人都可以获得幸福，且一旦拥有，不会再

失去。犬儒学派对后来的斯多葛学派产生重要影响。

早期的犬儒学派带有愤世嫉俗的倾向，后期犬儒主义的内涵则发生了微妙的转变，虽依旧蔑视世俗观念，但开始丧失赖以准绳的自身道德原则，变得倾向玩世不恭，对世俗的全盘否定变成照单全收，不知羞耻。

## **2.伊壁鸠鲁学派**

伊壁鸠鲁学派（约前 300 年出现）继承自苏格拉底时期出现的快乐学派，以创始人伊壁鸠鲁（约前 341-前 270）的名字命名。快乐学派在苏格拉底的伦理学说上发展开来，认为快乐即为至善。

有人认为，伊壁鸠鲁创立了史上一种全新的哲学理念：哲学是实践性的生活助力。全新的说法有些夸张，因为苏格拉底“未经审视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已经蕴含了实践哲学的意义。说伊壁鸠鲁主义是西方第一个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实践哲学更为恰当。

伊壁鸠鲁确立了生活的实践原理与具体的行为准则，由此肯定了哲学任务重心的转向。伊壁鸠鲁的快乐原则来自德谟克利特的物理学，早期的科学史家会说伊壁鸠鲁主义最大的贡献在于保存了早期的原子说，不过道尔顿的现代原子学说并没有受其影响的直接证据，但科学思想的渗透总是具有不经意性。

伊壁鸠鲁以原子论的机械方式描述了万物的起源，否定了神的影响，但他在将快乐视为道德哲学的终极目标时仍不免经历了逻辑上的跳跃，其中反映了伊壁鸠鲁本人的兴趣。伊壁鸠鲁主义认同快乐等于至善，并加以完善：快乐源于德性，一个睿智精明的人，最主要的责任就是选择一种明智的生活方式，并体味其中的快乐；对自己有利的原则是整个社会生活得以建立的根基，个人以自我护卫为目的的相互聚集（契约论）；正义无绝对，法律、制度只要能将平和安宁带给个人就

是合乎情理的。本质上说，伊壁鸠鲁学派的主张是利己的，但却是在不损害社会利益前提下的选择，可以视为后世利己主义的先驱。

提倡快乐主义的学说未必会得到普遍的欢迎，伊壁鸠鲁学派在希腊化时代和罗马时期的影响力远远不如提倡自我节制与道德自律的斯多葛主义，类似的情形也发生在西方世界的远东，“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的杨朱学派也在战国以后不见于世。这或许反映了以快乐本身作为终极目标的生命力，并不长久。

#### **4.斯多葛主义**

在希腊化时期以前，哲学家们积极地尝试探索人类知识的边界，寻找何为真正的知识，获得知识的方法与宇宙、自身的本因和源头，在形而上学的领域奋力耕耘，正如古典时期的希腊与文艺复兴后的欧洲；当边界已经拓展，新的观念已被发现，宇宙的法则在人类面前似乎又清晰一分，哲学家开始转向利用新的知识制定新的道德、伦理准则，这个过程也常与之前的探索同步开始，但总较晚成熟。在古典时代，这个过程中最具有影响力，也是理论最为完善的学派，是斯多葛学派。

斯多葛学派受到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赫拉克利特等哲学先贤的影响，也部分接纳初期犬儒主义的观点，并在他们的基础上，做出一些改变，提出了自己学派的理念。虽然斯多葛学派论述了亚里士多德所构建的哲学的三大部分：逻辑学、物理学和伦理学，但其影响集中于伦理学上。斯多葛学派创始人为塞浦路斯人芝诺（前 336-前 264），经过后来者们的不断发展，斯多葛主义于罗马共和国时期开始盛行于世。在斯多葛学者的道德哲学中，目标也在于幸福，但与伊壁鸠鲁主义不同，他们通过智慧（理性）去寻求幸福而不是在快乐中。斯多葛哲学从唯理的角度为伦理学提供创立的根基，这也是其根本的目的。在前辈哲学家的基础上，

斯多葛主义认为：知觉是知识的根源，所有知识都建立在感官知觉的基础上；理性是驱使语言和思维的能力；知觉推衍而得的普遍概念是知识的凭依。

斯多葛学派认同宇宙是美好、理性的整体体系，是目的论的、因此，在伦理学上，人的行动应与宇宙目的相契合，追求完善；要顺应自然而生活，与逻各斯相契合；唯一的善是德性，唯一的恶是没有德性。形而上学上的决定论和伦理上的自由意志都为其所宣扬。

在政治上，斯多葛学者主张衡量公民的唯一尺度就是道德，只有一种法律，即天赋之法律，只有一种人权，即天赋之人权。他们鼓励参政，认可集体利益，胸怀广博的世界。

此前，还没有任何一个哲学体系在实践的系统性上比得过斯多葛主义，斯多葛哲学为大众构建了一幅宏伟的哲学蓝图，并发展了一种强有力的世界主义思想——所有人都是同一个人类共同体的公民，这为罗马帝国的秩序提供了坚实有力的理性基础。但是，斯多葛主义始终只是属于精英的哲学，严格的自我约束与理性的生活并不会帮助在罗马帝国后期日益贫困的大众获取幸福，在普遍的社会危机中，基督教的信仰在抚慰更广泛的百姓上作用更大。

## **5.希腊文明与亚伯拉罕宗教的合流**

希腊化时代的亚历山大里亚不仅是西方学术世界的中心，也是多民族的汇集地，聚集了五湖四海的人，其中既有来寻求知识的学者，也有谋求生活的移民，不仅有希腊人，也有色雷斯人、亚美尼亚人、叙利亚人以及来自地中海东部贫瘠的沙漠地带的犹太移民，他们同时也带来了他们的宗教。

大约在公元前 250 年，可能是在埃及国王托勒密二世的委托下，亚历山大里亚的犹太居民开始将希伯来圣经《摩西五经》翻译为希腊语。根据传说，这项

翻译工作由 72 犹太学者完成，因此而产生了“七十子译本”的名称，这一名称很快就成了希腊语版《摩西五经》的专有名称。

这是希腊文化与亚伯拉罕宗教——或者按照雅斯贝尔斯的划分，即以色列犹太文明——的融合的开始，而之前犹太人一直生活在波斯帝国的统治下。亚伯拉罕宗教诞生于西亚的沙漠地区，其名称源于《圣经旧约》中的先知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宗教一神教的信仰显著区别于古希腊-罗马传统的多神教信仰，后者更富于世俗的精神，虽然宗教在古典时代的希腊与罗马人生活中扮演了重要地位，并带给了建筑与文学诸多灵感，但希腊和罗马的政府与社会却好像完全是按世俗的方式运作的，我们的精神世界也更接近于古典时代的希腊、罗马人而不是中世纪的欧洲人。

一神教信仰有着希腊哲学所缺乏的质朴简洁、不可阻挡的激情、信仰的启示力量以及凭宗教精神统一社会思想与社会活动的的能力。一开始信仰的力量似乎还无足轻重，但最终亚伯拉罕宗教的力量将变得难以抵挡。

## **6. 罗马与希腊文明的接触**

从文化的影响力及诸多方面来看，公元前 3 世纪早期是古希腊文化的鼎盛时期。自埃及穿行至南亚印度边界，仅使用希腊语已足矣。但希腊化王朝的统治并不都十分稳固，位于原波斯帝国亚洲核心地区的塞琉古王朝，就迅速在永无止息的冲突倾轧中走向衰落。

更大的威胁来自于西方，罗马共和国的扩张虽不及亚历山大帝国那般迅速，但却更为扎实稳步。罗马与希腊化诸王国的接触可追溯至公元前 270 年，但直到公元前 2 世纪初，罗马才首度决然参与东地中海的政治纷争。在挫败了两位希腊化王国的统治者之后，罗马并没有立刻吞并任何领土，而是以希腊自由的捍卫

者形象出现。罗马对亚历山大遗产的继承，是逐步进行的。在公元前 155 年左右，为了躲过一项罗马的罚金，雅典派遣了三位哲学家前往罗马，他们分别是斯多葛学派的帕奈提奥斯、柏拉图学派的卡尔涅阿得斯和逍遥学派的克里托拉奥斯。代表团并没有获得想要的结果，但这次出使却成为了古希腊哲学思想传播罗马的历史上的一次重要事件。还在共和国时期，罗马已经出现了后人称为“文化上的希腊人”的迹象，有朝一日，罗马帝国会把希腊人的文化和对希腊文化的认同传播到历史上最广大的地区。

关于罗马人的征服为何会如此成功，希腊历史学家波里比乌斯（约前 205-约前 125）的说法可做借鉴，他在公元前 167 年罗马攻占希腊后作为俘虏来到了罗马，与一些罗马人成为了朋友。波里比乌斯做了很大的努力，从哲学和文化史上为罗马帝国在历史中定位，为罗马作为世界霸权的合法性背书。他最后的结论是：宪法使得罗马成为合法的世界霸权，这是一种独特的君主制、贵族制、民主制元素的混合物，没有比这更好的制度了。这颇像是亚里士多德理想的翻版。

但毫无疑问的是，罗马最终接纳了希腊文化，罗马的古典文化成了帝国文化与希腊文化相融合的产物，罗马的众神几乎就是希腊神话的翻版，而斯多葛主义也成为了未被认证的官方哲学。哲学的思辨或许已经在希腊化时代达到了一个顶峰，但古典政治最辉煌的篇章才拉开帷幕。

## 六、罗马时代

### 1. 光荣属于希腊，伟大属于罗马

在尤利西斯·凯撒（前 100-前 44）被意图恢复共和国传统的元老们刺杀以后（有记载表明，凯撒对布鲁图斯的遗言“还有你，孩子！”是用希腊语而不是拉丁语说的，这从侧面表明了希腊文化的影响之深），他的养子兼继承人屋大维（前 62-14）在新的一场内战中胜出：先是与凯撒的旧部安东尼（前 83-前 30）和雷必达（前 89-前 13）组成后三头同盟击溃了共和派的布鲁图斯与卡西乌斯（于前 42），然后转戈向内，地位最低的雷必达最先出局（于前 36），与埃及女王克娄帕特拉结成同盟的安东尼也在前 30 年兵败身死，埃及随之成为罗马的一个行省，希腊化的时代正式结束。

罗马最后一位非基督教皇帝尤里安（331-363）在他为其前任们所写的幽默讽刺小品中，为元老院赋予了奥古斯都（受尊崇者）头衔的屋大维，被描述为像一条难以名状的变色龙。在很多情况下，奥古斯都的确像尤里安所描述的那样神秘、狡猾、难以捉摸和言此意彼，较之其养父，奥古斯都采用了更为隐蔽的方式来实现他的统治。而他为帝国所确立的制度被证明是可靠的，让罗马挺过了奥古斯都之后接踵而至的数位不堪大任的统治者，良好运转了 200 多年，保障了帝国的繁荣稳定。

据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1737-1794）所说，“如果让一个人在世界历史中选择一个人类最为幸福繁荣的时代，他会毫不迟疑地说，那是从图密善之死至康茂德即位的这段时间。”无论吉本的说法带有多少启蒙思想家对古典时代的美好幻想，罗马的“五贤帝”时期（96-180）都确实是古典时代最为辉煌灿烂的时期。

帝国的盛期往往是哲学思想的黯淡时刻，这一点同样可以在中国的唐王朝得到印证。进入罗马时代的希腊诸哲学，伊壁鸠鲁学派的影响极其有限，中期的斯多葛主义长时间里费尽心力地为帝国的现状辩护，在罗马治下的和平成为现实以后，斯多葛的伦理学开始转入私人领域，而不是试图在政治领域发挥影响力。

罗马帝国时期斯多葛学者分裂为两派：塞内卡（3-65）、马可·奥勒留（121-180）为通俗派的代表人物；科林图斯和赫罗克萊斯为科学派的代表，试图对最初的斯多葛学派学说诠释。皇帝马可·奥勒留是最后一位伟大的斯多葛主义者，他用希腊语撰写的《沉思录》虽然被后人批评为是充满格言体的陈词滥调，但作者写作的本意并不面向大众，而仅为自己。

当我们回顾罗马时代的贡献时，似乎在思想的成果上罗马人贡献甚少：除了盖伦的医学、托勒密（90-168）的天文学、老普林尼的植物学等少数人外，再没有其他的突出成就了。这种看法其实不大公平，罗马人的贡献在于将理论付诸于实践，罗马人乐意承认他们接受了希腊文化的恩惠，但罗马人的政治成就是无疑具有创造力而令人惊叹的，自然法的理念在罗马走进了现实，一个古典的时代记忆激发着文艺复兴以后欧洲思想家们的想象力。

## **2.怀疑主义与折中主义**

怀疑主义思想也要上溯至希腊化时代，其创始人是埃利斯的皮罗（前361-270）。在伊壁鸠鲁学派和斯多葛学派的同时，怀疑主义以质疑独断论的阴影的身份出现，怀疑主义认为事物的一致性无法认知，感官感知只是事物表象，与思维是矛盾，简而言之，怀疑主义者不相信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方法能够成功发现世界的真理。在怀疑主义者身上，我们能看见智者学派的影子，怀疑派也对这样的事实印象极为深刻，同样的“现象”在那些经验它们的人中会产生出各



种各样不同的解释。

怀疑主义的质疑为哲学的见解提供了更全面的视角,但当时的人却大都并不对这种看似是“过度”的疑虑所担心。或许也是受到怀疑主义的部分影响,折中主义思潮——试图求同存异,在不同体系中甄别被常识认可的观念——兴起,罗马时代的许多哲学家也由于其并不明显的偏向而被认为是或多或少的折中主义者,其中最著名的是伟大的演说家西塞罗(前 106-前 43)。但终归来说,怀疑主义只是开了一个头,在长时间都将处于伏流的状态,直到休谟的时代,才会成为触动哲学界的巨大力量。

## II 中古时代

## 一、罗马晚期

### 1. 历史的分期问题

启蒙时代及以后一段时间，历史学家常把西罗马帝国于 476 年的灭亡视为中世纪的开端。但其实无论怎么看，476 年所发生的事情都没有那么地重要，西罗马的末代皇帝罗慕路斯（巧合的是，与传说中的罗马首位国王同名）早在之前已经没有多少真正的权力，西罗马的疆界也退缩在了意大利半岛之上，他的退位不过是从实际到名义的统一。

我们不妨先简短地回顾一下马可·奥勒留在公元 180 年逝世以后罗马的经历，罗马帝国在天灾（瘟疫）与人祸（无能的继任者以及东方萨珊王朝的兴起）的多重作用之下，陷入到三世纪危机（235-284）之中，短短 50 年间便有 26 名皇帝出现，社会动荡不安，直到皇帝戴克里先（284-305 在位）时期才初步恢复稳定，戴克里先的帝制改革多多少少拯救了帝国的命运，松散的帝国逐渐变成了庞大军队与官僚机构支持下的专制国家。但戴克里先的另一项策略：以希腊语和拉丁语地区为基础将帝国划分为东西两部分，并实施四帝共治制，并不成功，在其自愿退位后不久便崩坏，引发新一轮内战。最终君士坦丁一世（307-337 在位）胜出，重新统一帝国，并承认基督教的合法地位。但罗马帝国分裂趋势无可避免，狄奥多西（379-395 在位）是最后一位统治全罗马的皇帝，也是在其任上基督教被定为国教。

如果说文艺复兴时期兴起的“黑暗时代”概念，关于中世纪与古典时代截然不同的说法在现代的史学家看来过分偏颇，中世纪早期的延续性大于历史的割裂性。即使我们现在并不认可对中世纪全面否定的看法，我们也无法否认中世纪的欧洲社会表现出近乎全面的衰退之势，如果说这也是对罗马帝国时代的特征继承

的一部分的话，应该说，这一倾颓的迹象已在狄奥多西逝世后逐渐明显。关注历史的延续性并不要求我们否认那些显然的衰退，但我们可以把历史的起因提前。我们将会看到，“三世纪危机”之后的罗马帝国已经不再是奥古斯都所建立的那个国家了，尤其在基督教成为国教以后，当中世纪的欧洲人再怀念罗马帝国的辉煌时，他们概念的罗马完全不同于文艺复兴时期人们怀念的古典时代的罗马，而是一个属于基督教的普世帝国，这是观念上的巨大差异。因此，我们叙述中世纪的思想与历史，也将从这一时期开始。

## **2.基督教与保罗**

没有任何 1 世纪的罗马文献谈论过基督教的创始人耶稣的事迹，耶稣的存在大概确有其事，但我们却不能确定地知道关于他更多的事情。可以知道的是，在耶稣被罗马当局处以死刑以后，他的一小群门徒和他们的“运动”惨遭失败，坦率地讲大概几近终结。

耶稣本人未曾留下任何确切的文字资料，基督教早期历史上这一至关重要的工作是塔尔索的保罗完成的。换句话说，保罗几乎是宗教真正的创立者。身为法利赛人，保罗曾是受过专业训练的《摩西五经》的教授者。或许正是凭借着这些基础，保罗得以重新解释耶稣的学说，并在其时命名为基督教。《圣经新约》中有一半为他所写，他还为基督信仰添上全新的内容，将其他宗教中成熟的传统习俗和哲学思想的片段融进基督教中：基督与古希腊哲学中的逻各斯被保罗等同起来；借鉴波斯的琐罗亚斯德教，保罗创造了原罪的概念，并发展了末日审判和救世主降临的观点。保罗拯救了基督教，使它没有变成一个注定要很快消灭的犹太教教派，并且将其当做一个世界性的宗教来加以宣传。

## **3.基督教与帝国**

罗马一直以来的信仰是包容的多神教体系，最基本的框架来自于希腊神话的影响，不过经历了一定程度的转换。罗马人相信国家的成功归因于与神保持良好关系的集体虔诚，罗马每当征服一个地方，都会将当地的守护神入罗马的万神殿中，罗马人认为当地人的失败正是由于神明更倾心于罗马。虽然罗马人对于神明是极虔诚的，也设立有许多与宗教相关的职位（如大祭司团、维斯塔贞女），但总的来说，就像希腊社会一样，罗马的政府与社会基本还是按照世俗的方式运作的。“自由主义”的宗教信仰并不能发挥一神教所具有的凝聚人心、指导社会生活作风的高效作用，更像是丰富社会生活的重要点缀。我们不太能知道当时一般民众的想法，但对于上层人士来说，斯多葛哲学所起到的指导意义或许更大。

一神教对唯一真神的信仰，使得基督徒对其他宗教信仰表现出毫不仁慈的不宽容，视其他信仰为不可容忍的异端，始终不肯服从帝国的宗教宽容政策，并拒绝对罗马皇帝进行祭拜。在宗教问题上通常很宽容的罗马人也做出了激烈的反应，正与中世纪晚期天主教会对于异端的残酷迫害相反，早期的基督徒再三沦为无端迫害的牺牲品。从尼禄、奥勒留，再到戴克里先，罗马皇帝们将基督徒当做替罪羊，认为正是基督教破坏了罗马的道德秩序，发动了一次次残酷的迫害活动。

但这些迫害并没有真正削弱基督教团体，相反，由于罗马的“官方哲学”斯多葛主义只能够抚慰精英人士的精神世界，而且凭理性对道德世界的追求，通常被证明只在社会能提供最基本的安定繁荣时才会对社会产生普遍的影响力。基督徒或许对异教徒并不宽容，但对于团体内部，却往往能表现出比多神教信仰更强烈的团结、友爱、互助精神。伴随着三世纪危机的一系列社会动荡，罗马多神教所作用的当世生活引发人们的强烈不安与不满，基督教的强大精神力量——包括对死后世界的美好允诺——开始吸引越来越多的下层百姓皈依信仰，教会泽

被众生，真正让贫苦百姓有了归属感和参与感，这是罗马帝国政府未能做到的。

上层人士也逐渐受到感染，加入到基督徒中来，进一步拓展了基督教的影响。

当时的罗马人看待帝国的衰落，普遍的观点是由于道德的败坏，皇帝戴克里先无疑认同这种说法，并将其归罪于基督徒身上，认为正是基督徒对罗马传统信仰的颠覆瓦解了帝国的凝聚力。戴克里先在其任上发动了对基督徒最为严厉、血腥也是帝国最后一次迫害活动，但就像他的前辈一样，基督教不会由于帝国的政策而被消灭。但戴克里先的看法至少部分是正确的——基督教确实在颠覆帝国的思想。就在戴克里先之后不到两代人的时间里，君士坦丁一世不仅再度统一了帝国，并且成为了第一位基督教皇帝，颁布《米兰赦令》（于 313 年）正式承认了基督教信仰的合法化。到了公元 380 年，皇帝狄奥多西再进一步，基督教被确立为帝国的国教，罗马已变成基督教的罗马。

#### **4.新柏拉图主义**

罗马世界最后一个有影响力的非基督徒哲学家是普罗提诺（204-270），他并不认可基督教的信仰，但他也明白，在 3 世纪的罗马，希腊哲学已不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基督教当时是以信仰与神性在吸引着人们的靠近，却还没有哪一种令人信服的哲学理论能满足人们对如何在动荡不安的社会中的精神需求。

普罗提诺关注到柏拉图理念论中所蕴含的潜能，他创造性地发展了柏拉图的理论，因此被称为新柏拉图主义。普罗提诺把对实在的思辨性描述和关于救赎的宗教理论结合在了一起，像柏拉图一样，他将精神世界从感性的世界中区分出来，置于经验的弊端。在精神世界里，最高层的是作为太一的神，第二层是绝对精神，第三层是灵魂。而可以感性体验的由精神塑造出的原初质料的世界，便只是次一等的。其中太一拥有所有的特质，只能通过冥思的方式接近太一，而与太一合而

为一成为了最终追求的目的。

普罗提诺把灵魂上升到与神的合一描述为一种困难和充满痛苦的使命，这或许恰好反应了当时的某种社会现实。概括地说，新柏拉图主义为理性和信仰之间搭起了连接的通道。也许有人会将它当做是基督教的强有力的替代品，但新柏拉图主义本身过于复杂的体系阻碍了它的传播，但新柏拉图主义确实对基督教产生了重要影响，基督教学者试图通过新柏拉图主义将基督教与哲学相结合。新柏拉图主义在中世纪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已经是作为基督教思想的一部分，普罗提诺的著作最后成为了古典哲学与基督教神学之间关键性的过渡。

## **5.奥古斯丁与教父哲学**

奥古斯丁（354-430）是罗马帝国在北非希波的主教，在他的时代，基督教已经成为了帝国最重要的信仰。但一神教对异端绝不相容，以及教义上细微差别便会成为异端的特质，使得基督教会在3世纪除了要对付内部非“正统”的学说外，还面临着在3世纪新诞生的摩尼教——亚伯拉罕宗教的最新存货——的威胁。使基督教更具有吸引力并且理论体系更充实，弥补缺陷、界定教义、捍卫理论、宣传学说，这个任务是由教会中被称为“教父哲学”的神学家们完成的，他们之中最有影响力人正是奥古斯丁。

奥古斯丁在米兰的学习期间接触到了新柏拉图主义。新柏拉图主义克服了奥古斯丁先前的怀疑主义、唯物主义以及二元论思想。通过新柏拉图主义，奥古斯丁可以理解到并非所有活动都是物理活动，精神的实在和物理的实在一样，也是存在的。他看到了世界的统一性而无须设想在灵魂和肉体的背后有两个本原。新柏拉图主义最终使得基督教在他看来成了合理的东西，并激发了他的著述活动。

奥古斯丁与贯穿中世纪始终的有关信仰与理性的关系的长期争论有密切关

系。中心议题是要判定:重要的哲学和宗教信念究竟是建立在信仰还是理性的权威之上,抑或建立在两者的某种结合之上?奥古斯丁遇到了和后来笛卡尔同样的问题,即怀疑论的质疑,奥古斯丁构造了一个类似于“我思故我在”的证明,但止步于此,绝不涉及主体性思考的自我赋权,满足于驳斥怀疑论的观点而没有继续走下去。

奥古斯丁得到的基本结论为:上帝是全知的、全能、全善的;上帝允许人类背离善良,因其赋予人类自由意志;上帝制定惩戒规则,公正的惩罚人类的不善。他所作出的最重要的改变,或许是打破了希腊哲学的旧传统——灵魂的救赎是善良、正当的生活作风的直接结果,现在只有上帝能决定这些。这就是奥古斯丁的恩典学说。在此后的时间里,恩典学说与基督教会的统治密切相关,它促使信徒们抱持谦卑的姿态,且让他们处于令人不安的不确定性中。

奥古斯丁的学说是基督教会哲学第一次集大成,也可以说,正是奥古斯丁将哲学与基督教教义结合起来,开创了神学的传统,当中世纪的欧洲学者们说起“神学家”时,指的就是奥古斯丁。奥古斯丁的著作具有那个时代所罕见的广博,但上述的讨论或许已经初步提到了其最重要的影响。在公元 410 年,永恒之城罗马在帝国时代首次被蛮族攻陷,这给予了当时人以极大的震撼。罗马的陷落要求一个神学上的解释,奥古斯丁通过《上帝之城》以解释教会与罗马、精神权力与世俗权力,以及神之王国与尘世王国的关系。对于当时的人与教会来说,重点或许在于书中肯定了天上之城与尘世的政治制度是彼此分离的,因此即使罗马帝国的灭亡也不会影响人们对天上之城的向往。这项工作无疑是及时的,因为就在罗马的陷落后不到一个世纪,西罗马帝国彻底地走进了历史当中。



## 二、中世纪早期的历史

### 1.再论“黑暗的中世纪”

中世纪的早期主要指公元 5 世纪至公元 8 世纪左右的欧洲世界。当代的学术界(二十世纪下半叶以后)有这样一种矫枉过正的倾向:不仅中世纪不再是“蒙昧”、“黑暗”、“与古典时代判若云泥”的大衰退时期(一位批评家的对中世纪早期的描述“一具即将被拉下舞台的尸体,以便下一幕好戏能赶快开演”很有代表性,也颇有趣味,在此特别提及),反而兴起了这样一种观点“罗马帝国的晚期被视为罗马时代的巅峰,很多方面都没有中断地直接延续到了中世纪早期”或是其他类似的说法。但他们所提供的证据并不足以支撑对“黑暗时代”的全面否定,主要只是说明了中世纪早期的历史,仍旧是充满变化与发展的。将整个中世纪都笼统的概括为一段“野蛮的黑暗之海”固然并不准确,但拿来形容中世纪的早期阶段,也并非全然不合理,这方面的证据极多,下面我们将从几个方面对此作出简要的论证。

第一,政治秩序的缺失与经济的衰退。经济的衰败和政治上的退步在这一时期互为因果,很难说是哪一个最先发生,在彼此作用下陷入了恶性循环。经济上,考古证据表明,截至 550 年,西罗马的大部分地区呈现出经济结构持续简单化的趋势。曾经城市豪宅和乡间别墅大多被荒废,或是被分割成小型的住宅;手工艺品的尺寸普遍缩水,工艺水平有时也出现退化。同时,后罗马时代的几个主要蛮族王国的税收逐渐被对土地收入的依赖所取代,既反映了财政体系的简单化(特别是货币流通的薄弱化),也表明了国家行政机构的缩水。如果我们把“封建社会”视为比“奴隶社会”(就罗马帝国而言)更高级的社会形态,无疑会发掘其中的荒谬之处:封建制意味着一群卑微的人对少数豪强严格的经济从属,封

建制度的初衷希望利用紧密的人际网络的依附，以弥补其他社会组织如家族、国家无法正常发挥的作用。也就是说，“封建”的出现不是“进步”而是对“衰退”的补救。

第二，公共建设的停滞。在罗马时代，政府特别是皇帝对于公共建筑的修建有着特别的兴趣，从庞培的大剧院到图拉真记功柱再到君士坦丁一世的凯旋门，罗马时代的辉煌遗产彰显着帝国的伟大成就并留存至今。同时帝国也修建了连接各行省的道路，是为帝国的血管。在西罗马帝国灭亡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不再有大型公共建筑的出现，各地的道路也应得不到修缮而使交通状况变得极为恶劣。在一本关于 17-19 世纪的欧洲史中如此写道：“（18 世纪）欧洲的道路基本上是罗马帝国的遗产——尽管已经被疏于照管了 1400 多年”。

第三，学术的退步。在罗马帝国势力的瓦解之后，随着经济的发展呈现出灾难性的衰败，当生存成了第一要务，学术工作也遭遇了显著的挫折。我们试以医学的研究举例，虽然仍有少数医生在从事医学研究工作，但医学书籍的数量和水平大幅度下降。篇幅短小的“自助”手册代替了内容丰富的学术著作，理论知识很少，只有一些诊断和治疗方法的简要说明，很难能见到盖伦或是方法论学派的拉丁文医学著作。在医学文献如此稀缺的情况下，更不必提医学的进步。知识的流失当然并不只局限于某一领域，实际上西欧地区，也可以称为拉丁世界，除了有关基督教的书籍外，古希腊罗马典籍大量流失，其中自然也包括了古希腊哲学家们的经典著作。就连希腊原文的《圣经》也在拉丁世界不见了踪影。

第四，文化成果断崖式的下降。文献的流失伴随着的是新文化创造的匮乏

从上面所列出的证据，我们也可以初步的看到，从各方面来看，中世纪早期的西欧文明的的确确处于一个较为低沉的状态，也在某种程度上契合了文艺复

兴时期学者们对“黑暗”时期的想象。而说到中世纪为近现代社会所奠基那些要素，无论是理性主义、教育的普及、政治制度的构建，其雏形几乎无一不可追溯至古典时代的希腊、罗马，而离中世纪早期更为遥远。既可以说近代社会的发展是以中世纪为基础的，也可以认为这是在接续古典时代的文明传统，并加之以全新的创造，名之曰“复兴”亦无何不可。在西罗马帝国灭亡后的两个世纪内，原罗马帝国的旧址上实际变成了三个有着显著差异却也互相联系的世界：西欧地区的拉丁世界、希腊语的拜占庭帝国，以及在沙漠中崛起的伊斯兰帝国。下面我们将对其分别展开叙述。

## **2. 拜占庭的早期历史与哲学发展**

在希拉克略（610-641 在位）改革以前，东西罗马具有一样的政府体制与经济制度。然而东罗马存留下来，西罗马灭亡了。这一点至少证明了西罗马的灭亡不仅仅是帝国后期制度本身的严重缺陷所造成的。在东罗马皇帝，也是最后一个说拉丁语的皇帝查士丁尼（527-565 在位）任上，帝国收复了大量的失地，包括罗马在内。但查士丁尼的统治也被认为是极富有争议的，因为他给继承人留下了一个因战争而空荡荡的国库，以及蛮族群伺的不安局势。收复帝国的雄心壮志遭到夭折，许多土地得而复失。

虽然东罗马人从未称自己是什么“拜占庭”，但帝国在经历了七世纪早期（609-642 年间）一系列灾难性事件后，历史学家往往将其视为东罗马向“拜占庭”的关键性转变——帝国是在为维持生存而努力，四面环绕的强敌，加之内部结构性的危机，已无力重现古罗马的荣光。这一点突出表现在希拉克略开始的“塞姆制”军区改革，这一防御性质的改革使得地方社会大体上被军事化，或许这也正是导致拜占庭时期的帝国不比古罗马文化更为活跃的因素之一。

与同一时期拉丁西方世界贫乏的古代哲学文献相比,以希腊语为母语的拜占庭学者可供利用的资源浩如烟海,令人难以置信。然而,有两个因素遏制了学术的创新:一是对任何与前基督教的古典文化相关的东西的怀疑,尤其在涉及的文献违背了基督教的教义时;二是拜占庭学者对百科全书式的博学的敬仰,这种学问概述、摘录、转写或者重写历史文献,很少包含中世纪传承者的思想。

上述的第一点,清楚地彰显了基督教时代的帝国文化已远远不同于“异教”时代的帝国文化。在 529 年发生了一件象征性大于实质意义的事件,查士丁尼大帝永久的关闭了雅典学院,驱散了学院的异教徒学者阿摩尼乌斯等人。从此学术的思想不能逾越基督的信仰。

在拜占庭的马其顿王朝(867-1056)时期,帝国迎来了短暂的繁荣时期,领土得到了有限的扩张——仍远远不及查士丁尼时期。帝国的文化也迎来了一次复兴,但却不是“文艺复兴”式的重大转折,仅仅是一场关于文学的、撰写学术摘要的热潮。虽然创造性地成果有限,但至少为西欧地区后来的复兴存留下宝贵的典籍资料。为何拜占庭的学者在创造性的工作方面,甚至还比不上他们在拉丁世界,享有更糟糕的学术资源的同行们?部分原因在于帝国相对更发达的经济,与更高组织度的政治机构,使得基督教教义在思想上的约束力更能得到有效施展;以及拜占庭学者可能更关心在内外交困的环境中,国家的生存以及知识的延续被放在了更重要的位置。

### 三、伊斯兰世界

#### 1. 伊斯兰的兴起

在 7 世纪到 9 世纪的相当长时间里，拜占庭最大的敌人就是崛起于阿拉伯半岛的伊斯兰帝国，至少在不连续的近两个世纪的时间内，伊斯兰帝国都是罗马帝国旧址上最为强大的政治存在，这既体现在军事实力上，也表现于文化的创造中。也可以说在这一时期，对于希腊-罗马古典文明的传续以及发展起到最大积极作用的，不是基督教世界，而是伊斯兰世界。

伊斯兰教创立初期的信仰主体为阿拉伯人，在阿拉伯早期神话及《圣经》《古兰经》中都有记载，阿拉伯的先祖和犹太人的先祖皆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这虽然不是什么肯定的历史，但表明，阿拉伯与亚伯拉罕宗教深厚的渊源。

在穆罕默德（571-632）创立伊斯兰教之前，阿拉伯半岛大部分地区都属于大大小小的阿拉伯游牧部族，他们各自的信仰也不一而足，有的受罗马帝国的影响信仰基督教，有的受波斯影响信仰祆教，还有的信仰阿拉伯的原始宗教。不同的阿拉伯部落常年间互相征战，却始终未有足够强大能统一半岛的力量出现。直到穆罕默德认为自己受到了真主——与基督教中的耶和华为同一者——之命，创建并传播伊斯兰教，历经多位伊斯兰领袖的指挥及数十年的战争，不仅阿拉伯半岛得以统一，甚至创立了以伊斯兰教为核心的倭马亚王朝（661-750），领有比控制约五百万平方公里的图拉真时期的罗马更大的疆域，在倭马亚王朝之后的阿拔斯王朝（750-1258）时期，伊斯兰文明迎来了它历史上最为辉煌的时刻，领土面积最大时约为 1260 万平方公里，但人口只有约 3000 万，不到罗马帝国人口峰值的一半。

伊斯兰势力的迅速扩张离不开创教早期所具有的显著政治性，与早期基督教

不同，穆斯林社群中的宗教分歧大体上不涉及真主的性质问题（真主就是安拉，很简单，没有什么可争辩的，而基督的三位一体就复杂得多，容易引发不同的理解），而是更多地把焦点集中在政治合法性上。虽然同为亚伯拉罕-一神论宗教，但伊斯兰教在政治上的浓厚色彩冲淡了在信仰上的计较——穆斯林对待异教信仰，远比同时期的基督徒来得宽容。在伊斯兰教统一阿拉伯半岛，倭马亚王朝建立之后，包括基督教、犹太教、祆教在内的异教信仰在帝国境内未被禁止，缴纳一定数额的税款便可保留信仰。来自希腊的数学、天文学、物理学、行为上学等知识也在这样相对宽容、政治稳定的伊斯兰社会得以保存。

## **2. 伊斯兰的哲学**

伊斯兰哲学有两个最重要的分支——凯拉姆传统以及以希腊知识为根基的爱智学。“凯拉姆”的原意为“词语”，后用来指凭借理性来为自身信仰辩护的伊斯兰神学，相当于基督教世界的经院哲学，只不过发展的时间更早。“爱智学”主要继承的是古希腊自然哲学的传统，阿拉伯学者在此基础上也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伊斯兰哲学的真正发展要到750年建立的阿拔斯王朝时期才有真正的发展。李约瑟曾略带夸张，但却大体正确地写过“阿拉伯人拥有古代西方世界全部的文化财富”。事实上，伊斯兰哈里发国所保留的罗马帝国的社会形态恐怕比后罗马世界的任何其他地区都要完整。在伊斯兰政权建立以后，政府开始收集、保存古典时代的学术著作。这一活动在阿拔斯王朝的第七代哈里发，马蒙（813-833在位）时期达到高峰。

马蒙继承并大力发展了其父拉希德（786-809在位）创立的智慧之家——位于阿拔斯王朝首都巴格达的图书馆与翻译机构——并依托于此开展了西方文

明史上举足轻重的“百年翻译”（约八世纪中期-十世纪末期）运动，大量来自希腊、波斯、印度的书籍被翻译为阿拉伯语保存在智慧之家中，许多因基督教信仰或政治经济的动荡在欧洲流失的书籍在阿拉伯得到了传承。九世纪的巴格达无疑是当时西方学术世界的中心，此前只有希腊化时代的亚历山大里亚可相媲美。与拉丁世界寥寥可数的学术书籍，以及拜占庭缺乏创造力的书籍写作相对照的，在伊斯兰这个非常活跃的文化世界里，9-10 世纪遗存下来的阿拉伯语文字作品不仅数量惊人，而且神学、哲学、法学、诗歌、行政、历史、药学、科学和地理等领域都涌现出了各自的专家与富有创造性的成果。

## 2.阿维森纳

我们主要关注的是西方的哲学传统如何一步步从古希腊演变至现代的，虽然在中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拉丁世界的哲学创造远不如伊斯兰世界。但最终还是在拉丁世界——西欧地区最先开始了所谓的“近代化”历程。由于篇幅所限，伊斯兰哲学的诸多成果与思想，不能在这里一一呈现。

阿布·阿里·侯赛因·伊本·西耶（980-1037）生活于巴格达东边的布拉哈，在拉丁世界被称为阿维森纳，他是阿拉伯传统最重要的哲学家，也是中世纪著名的科学家。他对 12 世纪晚期之后的拉丁思想家影响深远，同时在接下来超过六个世纪的时间里伊斯兰更多的哲学发展主要仰仗于他。

阿维森纳清楚地将自己视为亚里士多德派的思想家，但也会毫不犹豫地重构或纠正亚里士多德的看法，这与在巴格达居于主流的、更加顺从的亚里士多德主义截然不同。

大多数中世纪的哲学都在一点上用力——试图调和哲学和神学两大领域，这是经院哲学的“要义”所在，阿拉伯穆斯林无疑是基督徒的先驱。阿维森纳在

神学上最主要的构建是他对创世说的表述，他把亚里士多德主义和新柏拉图主义的观点结合到了一起，并给出了关于上帝存在的证明。他以某种方式标示出了上帝与其造物的差异，这种方式为后来的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神学家所接纳。

阿维森纳在科学上的贡献主要集中于医学，他写过中世纪权威医学著作，展示了作者对盖伦医学的精辟理解，代表了盖伦所倡导的当时哲学与逻辑学的最高学术水平。这本书也成为了中世纪欧洲大学的标准医学教科书。

### 3.阿维罗伊

阿维罗伊（1126-1198）出生并生活于西班牙地区，在拉丁世界，他拥有在伊斯兰世界所缺少的读者和名望。他对西方哲学的贡献代表了伊斯兰学术影响的另一个维度，即对以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为主要对象的古希腊典籍的评注。

在百年翻译运动刚开展的时期，阿拉伯的学者就已经开始了对亚里士多德著作的评注，后来许多基督教的著作家正是凭借这些评注来理解亚里士多德的思想的。结果，这些对亚里士多德思想的穆斯林解释不仅提供了关于亚里士多德的许多知识，也由于穆斯林学者在注解时所作出的“创见”造成了许多严重困难。阿维罗伊是这些评注者中声名最大的，既是由于他个人的才智，也是由于作为阿拉伯世界最西边的伊比利亚半岛也是伊斯兰世界与拉丁世界的边界地带，最频繁的思想交换就从这里开始。

阿维罗伊学说中最“恶名昭著”的是后人所称的“双重真理说”。其实阿威罗伊只是说，哲学和神学各自都有其功能，这是因为有它们分别为之服务的各种不同类型的人。这一将哲学与神学相分离的看法在经院哲学家那里引起了相当大的震动，成为了哲学走出“神学的奴婢”时代的肇始。不过后来此说有了一种最为极端的形态，认为两个互不相容的断言——比如，关于宇宙创生的互不相容



的宗教和科学断言——可以同时为真，不仅被乔治·奥威尔写进了书中，也成为了某些地区的现实。

#### **4.伊斯兰世界的学术影响**

以拉丁世界的视角来看（欧洲中心论当然不可取，为了叙述上的方便，这里姑且为之），伊斯兰学术的最大影响或者说“贡献”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保存了希腊-罗马古典时代的学术典籍，为西欧在社会经济恢复后学术上的发展，有了可以承续的基础，也使得文艺复兴时期的学者们，不至于只能对着古希腊、罗马的遗迹空发思古之幽情；其二，伊斯兰哲学的凯拉姆传统，实际上是拉丁世界经院哲学的前身，为基督神学中的许多问题提供了“伊斯兰版本”，在时间上的优势影响了基督教学者的思考方式；最后，伊斯兰世界也是当时科学成果的中心之一，在地理位置上的优势（地处欧亚交界），使得东西方的学术成果都能在阿拉伯世界汇集，阿拉伯学者既发展了光学、医学、化学、天文学的知识，也将中国的指南针、火药，印度的数字系统等科学成果传播至欧洲，奠定了科学革命的知识积累。

但似乎神权政治的国家，其兴也勃，其衰也骤，在9世纪中叶阿拔斯王朝的内战之后，阿拉伯帝国迅速衰落，并在10世纪早期崩溃为数十个大大小小的独立政权，失去了政治上的优势地位。其后的数个世纪内，伊斯兰世界还是保持了一段时间的学术优势，但随着西方世界文艺复兴及新教改革的突破，阿拉伯故地兴起的奥斯曼土耳其却无法在哈里发的治下实现伊斯兰教的宗教革命，曾经的领头羊也落在了后头。

## 四、中世纪早期的拉丁世界

### 1.中世纪早期的历史

在西罗马帝国的遗址上，建立起的是数个大大小小的蛮族王国，北非是汪达尔人的王国，伊比利亚半岛是西哥特人王国，法兰克人在高卢（大致在今天的法国地区）建立统治，意大利半岛则主要是东哥特人的地盘，不列颠行省则为盎鲁-萨克逊人所占据。当东罗马帝国查士丁尼大帝短暂的光复运动退却后，意大利半岛和北非地区又经历了一次洗牌，北非回归帝国直到穆斯林人在 697 年的征服；意大利除了少部分地区为帝国所控制外，又陷入了伦巴第人的入侵中。

蛮族的统治远远不是更换统治者那么简单，除了前面提到的社会经济、文化的全面衰退外，蛮族也带来了新的观念，其中有好有坏。蛮族的习惯法最终演变为近代法律体系中的普通法，并树立了限制国王权力的观念；但蛮族特别是哥特人以及法兰克人，将国家视为统治者个人私财，并在国王死后习惯将领土平分给有继承权的后代，这无疑是政治观念上的大退步，人们效忠的对象不再是国家而是领主个人（罗马在戴克里先改革后也有让臣民向皇帝效忠，但终归还是有共和国的传统存在）。直到启蒙运动以后，欧洲才又重新建立起关于“国家”的一整套理念。

罗马的行政机构在少部分地区苟延残喘，最终都消失不见。即使是在王国的内部，经济、政治的地方化现象也极为普遍，国王所能够行使的权力比名义上权力还要来得有限。而且由于上述继承法的缘故，在 6 世纪的北部欧洲任何时候都有大约 200 个国王，连王权都地方化了。在这些蛮族国家中，比较有影响力的是法兰克人的墨洛温王朝，在持续不断的家族争端和地方自治下，仍能成功统治两个多世纪，直到让位于加洛林王朝，不能不说是一个不小的成就。

## 2.波埃修和伪狄奥尼修斯

在西罗马灭亡到查理曼大帝（800 年加冕）这漫长的 3 个多世纪内，波埃修（约 480-约 524）是少数仍能了解古希腊哲学所有流派的人，也是最后一个有名有姓（这个限定很重要）有影响力的哲学家。

波埃修曾担任东哥特王国的创立者狄奥多里克的机要大臣，尽管声望素著，官阶显赫，他还是因严重的谋逆罪嫌疑而被剥夺了各种荣誉，受到了长期监禁，最后被处以死刑。在狱中，波埃修写下了他的名作《哲学的慰藉》，本书在中世纪广为流传，是最受欢迎的一部文学哲学作品（不过大部分时间里，本来拉丁世界的哲学作品就少得可怜）。身为基督徒的波埃修，在他的《哲学的慰藉》中，没有谈到基督教，而是系统地表述了一种基于人类理性自身能够提供的东西之上的自然神学。

波埃修对中世纪哲学的另一影响，体现在他是新柏拉图主义课程体系中得到发展的古代逻辑学，在拉丁世界的主要传播者。后来经院哲学关于共相问题的激烈讨论，与波埃修也不无关系。

大约在 500 年左右的时候，一部冠名为“狄奥尼修斯”的新柏拉图主义著作集在西欧流传，狄奥尼修斯是圣保罗在 1 世纪时的一位弟子。学者们现在以为这些论文大概写于接近 500 年的叙利亚地区，“狄奥尼修斯”是作者的化名，现称为“伪狄奥尼修斯”。

伪狄奥尼修斯对世界和上帝的关系给出了一个说明，在其中他把新柏拉图主义的溢论和基督教的创世说结合到了一起。他还为所有宗教职业做了分类和分级，连天使都被置入一个垂直的秩序体系中，这个体系还被后来的诸多基督教思想家视为模板。

总的来说，伪狄奥尼修斯在将新柏拉图主义与基督教思想相结合的路上，比奥古斯丁又多走了一步，普罗提诺的“太一”和基督教的上帝合而为一。到此为止，基督教在中世纪的早期关键教义基本被确立了下来，下面是其中一些摘要：一，基督教会对真理的绝对代言；二，以唯一善的上帝统一体取代祆教的善恶二元论；三，三位一体学说为正统，即圣父、圣子、圣灵既是三个，也是同一人格；四，原罪学说，亚当的罪行使人类堕落，而基督拯救了人类；五，恩典学说，人的得救全凭上帝的旨意；六，与新柏拉图主义的区别，人类不能通过自己的力量来接近神性的一。

### **3. 教皇与教会**

在中世纪早期，公元 1000 年以前，西欧地区的基督教教会与贸易一样，呈现出相当程度的地区化特点，教会以及教会的代表教皇的影响力在大多时候也相当有限。这也很好理解，因为教会也是一个行政机构，要将神的恩典统一地施予各地，实现文化思想上的部分统一，需要足够复杂的经济系统的支撑。在中世纪早期西欧普遍的衰落中，基督教会更多时候也是以受害者而不是施害者的身份出现的。在 550—750 年之间，教皇虽然名义上是拉丁教会的大主教，但是法兰克、西班牙，甚至意大利北部的人都没怎么把教皇当回事。但是在这西欧衰落的过程中，教会既是知识的保存者，也由于教会对知识的特定倾向，古希腊罗马典籍在西欧地区的遗失，教会也需负有相当的责任。

当东罗马帝国于 6 世纪后期在意大利半岛逐步退却时，罗马等地是少数帝国仍保留影响力的根据地。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东罗马皇帝对教皇的任免享有绝对的权力。但教皇也有意加强自身的独立性，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是教皇大格里高利（590-604 在位）。他是中世纪早期的教皇中少数具有真才实学的人物。由

于史料的缺失，我们对他的作为还不是完全清楚，比较明确的是他编辑了一部规则手册《牧灵准则》，强调了神职人员对俗世行为的指导；大格里高利还积极参与高层政治活动，在英格兰地区获取了真正的影响力。无论如何，教皇的初步努力是有回报的：东罗马皇帝在 653 年尚有能力罢黜在宗教上挑战其权威的教皇马丁一世，但到了 687 年，皇帝就没有能力罢黜时任教皇塞尔吉乌斯一世了。但教皇职位独立性增大并不影响教会的权力仍很微弱的客观现实，至少到公元 1000 年的时候，西方的教会始终没有在真正意义上形成一个以罗马为核心的组织体系。

中世纪早期教会的影响力仍是有的，但不是凭借科层制体系发挥的作用。修道院——守贞的修士和修女隐修之地——是西方中世纪早期文化领域的一股强大力量。修道院的存在部分类似于中国南北朝存在于中原北方地区的坞堡，在混乱的局势中，有的修道院甚至有自己的武装力量，修道院既是信仰的保存之所，也是保存和生产抄本——写在羊皮或牛皮纸上的书籍，通常与基督教有关，也偶有其他题材——的中心，也是中世纪早期学术与思辨的微中心。

#### **4.查理曼的复兴**

在墨洛温王朝的后期，大权基本上为世袭的宫相所把持。等到宫相丕平（714-768）的时候，他通过帮助教皇摆平罗马北部伦巴第人的威胁，并赠予教皇罗马周围的大片土地，奠定了教皇国的基础。得到教会支持的丕平于 751 年加冕，成为加洛林王朝的第一任国王。

法兰克王国在丕平的儿子查理曼（742-814）统治之下，领土得到了极大扩张，此后只有拿破仑和希特勒的帝国曾在欧洲的腹地领有如此辽阔的国土。查理曼除了极大的扩充了帝国的疆土，并在罗马获得了“罗马人的皇帝”的荣誉称号

外，其在文化领域也推出了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政策，发展了所谓“道德化政治行为”：让国家政权和半自治的教会建立起了更为紧密的联系，统治者可以任命自己的主教，但主教也有义务监督道德世界。这一改革部分出于加洛林家族强化统治根基的目的，因为在丕平上位不久，王权的合法性立刻就遭到了质疑，查理曼也需要宗教的力量加以背书。查理曼的“宗教道德”运动大概是西罗马灭亡以后的首次有较大影响的文化复兴举措，查理曼和他的继承者们创造出了一个以带领全体人民走向宗教救赎为目标的完整政治计划，并将这个计划覆盖到了欧洲的大部分地区，将基督教会与世俗政治捆绑在了一起。但显然，这一文化复兴的尝试，成果丰富，但对于帝国而言作用时间极为短暂，部分原因是法兰克帝国的脆弱性：即使是在法兰克王国最辉煌的查理曼时代，其社会发展程度也无法与强大的阿拉伯帝国或是有着悠久传统的东罗马相提并论；加之以法兰克人的分割继承制，帝国还未来得及巩固便自然崩塌。随着加洛林世界在 9 世纪后期的终结，这场由查理曼开启的短暂复兴也宣告结束，但国家政权与教会的“伙伴”关系得到了延续。额外值得注意的一点，加洛林的宗教改革，与拜占庭公元 800 年左右的著书之风，以及阿拉伯著名的“百年翻译”运动，基本发生在同一历史时期，这大概不只是一种巧合。

## **5.阿尔昆与爱留根那**

阿尔昆（736-804）是查理曼时代文艺复兴的第一位代表人物，他晚年主要的活动领地是查理曼的宫廷，宫廷中汇聚了学者、拉丁诗人和思想家。在 8 世纪 90 年代，阿尔昆和他的学生促成了帝国的教育改革——为帝国的下一代教士建立统一的教育体系，建立一种标准字体。

在阿尔昆和他的学生们的著作中，拉丁世界的哲思所采取的延续至 1200 年

的三条路径已经彰显：以逻辑为形式并且由逻辑激发思考；对基督教教义的分析；联系为数不多的古代哲学文献。

在阿尔昆之后不久，另一位活跃于法兰克宫廷的爱尔兰学者约翰·司各托·爱留根那（810-877），建立了中世纪第一个稍显完备的哲学体系。在爱留根那的思想中，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他为自由意志所作的辩护。但在其身后，爱留根那关于人及其自由的类似现代化看法并没有得到继承。

## 五、中世纪盛期的拉丁世界

### 1. 基本社会历史背景

笼统地观察中世纪的发展脉络，大致呈现出一个类“W”型的趋势，中间的峰顶比两头都要低，后一低谷则要高于前一低谷。随着欧洲社会经济的恢复，西欧的政治实体能够发挥的作用得到了扩张，欧洲社会迎来了普遍的上升期，因而得以被称为“中世纪盛期”（约 1000 年-约 1375 年）。

在 1054 年基督教会正式分裂为以罗马教廷为首的天主教，和以君士坦丁堡牧首为精神领袖的东正教，分裂的种子早在数个世纪前已埋下，这一年无非是一次确认。在社会文化以及政治领域首先发生的大事，是天主教廷的改革，这是一场教廷内外（外指的是世俗人士，如神罗皇帝亨利三世）共同参与，具有广泛社会参与度的运动，而不只是少数教会改革人士的突发奇想。随着改革的进行，教会及教会的领袖教皇的权力得到了显著的提升，至少是从名义到实际的转变。这一过程中，标志性的事件有两个，一是教皇格里高利七世（1073-1085 年在位）任内所实施的改革，主要的内容如下：

第一， 规范了教皇的选举过程，坚定的排除任何俗世的影响。

第二， 禁欲主义被写进教会法规。

第三， 教皇渐渐控制了整个教会体系的所有阶层。

格里高利七世的改革是早期改革活动中最为有影响力的一次，当然，并非说所有措施马上就顺风顺水地得到落实，没有起伏，格里高利七世后来为神罗皇帝亨利四世所威胁，死于流亡之中，便是改革中的动荡与反复极好的注脚。但无论如何，教会的权力还是逐渐得到了提升，并在英诺森三世（1198-1216 年在位）任上，教皇的权势达到了顶峰，他甚至令英格兰、匈牙利等地成为教皇封地，这些地区



统治者至少成了教皇名义上的封臣。英诺森三世在 1215 年（英格兰《大宪章》签署的同一年）主持召开的第四次拉特兰会议，是教会改革的又一次标志性的事件，会上通过了诸多的教规，阐释了天主教信仰的本质及架构，也不乏一些有着积极意义的规定（如禁止神父主持酷刑神判），彰显了教会这一时期在拉丁世界无上的权威和实力。

另一件牵动了整个拉丁基督教世界的大事，则是十字军运动的兴起。第一次十字军运动发动于 1095 年，十字军夺回耶路撒冷的消息和虔诚基督徒的善行使西欧的人们确信，教廷和大众发起的改革已经使基督教获得了复兴。此后又经历了数十次大小规模不一的十字军运动（还包括有基督徒在伊比利亚半岛对穆斯林国家发动的再征服运动），东征得以发动本身，即有天主教会权力上升、基督教在社会文化思想生活中愈发重要的因素在内。

## **2. 古典文献的回归**

但中世纪盛期对于拉丁世界的文化领域，影响最大、最深远的事件，是在西欧地区失传了近 5 个世纪的希腊-罗马古典文献的回归，实现这一伟大创举的途径主要有下面几种：

一，十字军东征的影响。通过十字军运动，史无前例地让拉丁世界数量庞大的基督徒们，不仅能够踏上拜占庭的土地，还得以与伊斯兰世界发生直接的接触。经历了十字军远征的人们回到西欧后，有些将原本收藏于穆斯林和拜占庭世界的图书馆的书籍带了回来，从希腊语或阿拉伯语翻译成拉丁语。

二，西班牙和西西里地区的译文。虽然统一的阿拉伯帝国已在九世纪解体，但在公元 1000 年以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西班牙和意大利西西里地区的大部分仍为穆斯林地方政权所控制。这些地方同时又与拉丁世界直接接壤，因而成为

了思想交流的极佳通道。大量阿拉伯文的古典文献经过西班牙、西西里进入拉丁基督教世界，或是直接在当地翻译为拉丁文后再传入，西班牙的托莱多是 12 世纪最重要的翻译中心。经济复苏的拉丁世界对知识的探求（至少是出于对以理性证明信仰的需求）提供了巨大的需求。

三，欧洲各地零散的翻译活动。在中世纪盛期，由于交流的频繁，阿拉伯文乃至希腊原文的文献在欧洲多地出现，翻译运动也呈现“四处开花”的局面。比较重要的翻译家有威尼斯的詹姆斯，在意大利修道院的康斯坦丁，穆尔贝克的未来呢。

11-14 世纪的翻译运动，为拉丁世界提供了“消失”已久的“新”材料，在古希腊-罗马的思想家中，最有影响力的是亚里士多德，他的思想构成了经院哲学时代最重要的理论基础。

### 3.共相问题

共相问题是唯名论与唯实论的争辩，简而言之，唯名论认为普遍存在的概念（共相）并不是实在的，而唯实论则与之相反，认为普遍存在的概念（共相）包蕴于事物之中。唯名论与唯实论可以追溯至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关于形式实体化的讨论，但唯实论与唯名论的矛盾主要是中世纪经院哲学探讨的题目，柏拉图的思想或许可以被归结为唯实论的，但亚里士多德既对唯名论也对唯实论产生过影响，明晰的划分在希腊哲学家那里并不可靠，实际上也意义不大。

但共相问题在基督教的时代却有着重要的意义。在罗马皇帝君士坦丁一世下令召开的第一次尼西亚会议（325 年）上，三位一体（圣父、圣子、圣灵本质一致）的神学理论成为正统基督教所肯定的信仰，其他观点则被斥为异端。唯名论所推出的结论与三位一体的信念相对立，因此唯实论长时间里为主流教会所认同，

认为对基督的世界观有益，但唯名论也并未就此消散。中世纪关于共相的问题最初是由普罗提诺的学生，新柏拉图主义者波菲利（233-305）提出的，并在波埃修那里得到了最初的回答。在其后的5个世纪内，基督教世界的学术没有什么进展。但随着社会的复兴，学术的讨论愈发得到重视，尤其是在亚里士多德的原著（可能经过了阿拉伯学者的评注）传入西欧以后，共相问题的争论愈发激烈。我们今天或许不会认为共相问题有什么重要价值，但在那样一个信仰胜过理性的年代，对共相问题的回答除了会导出一些关于神学的重要结论外，也关乎这一时期哲学的发展。

在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产生重大影响之前，早期的经院学者们关于共相的问题至少有三个主要的观点：奥多（1060-1113）与威廉姆·香浦（1070-1121）是极端实在论的代表，认为共相实际上就是实在的事物；与此争锋相对的唯一论观点由洛色林（1050-1124）提出，他拒斥把共相变成一个事物的企图；同时是香浦和洛色林学生的阿伯拉尔（1079-1142）试图调和两个老师的极端观点，他的结论是：共相是一个语词和概念，它代表了某种为该概念提供依据的实在；共相有一个客观的基础，但不是像实在论者所认为的是某种像事物一样实在的东西。阿伯拉尔的观点被称为概念论或温和的实在论，赢得了时人的称赞。

不过目前为止经院哲学对共相问题的讨论还只是开了个头，这不过是思想界大地震的一场前震，那时候我们对共相问题的意义也会看得更加清晰。

#### **4. 托马斯·阿奎那**

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中世纪的欧洲常被描述为“信仰”的时代，而从中世纪到近代的转变，按照马克思·韦伯的“祛魅”说，即从“信仰”向“理性”时代的转变。这一转变就像之前从古典时代像中世纪的变化一样，都不是一蹴而就

的，其中有漫长的过渡时期。经院哲学的宗旨本就是信仰与理性的混合，除了上述的共相问题外，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问题也是被神学讨论的对象（如针尖上能占几个天使），“哲学是神学的奴婢”的概括也不无道理。神学问题中最古老也是最重要的是上帝存在性的证明，中世纪盛期的学者已不满足于奥古斯丁的证明方式，在理性的方法再度被普遍接受的过程中，神学是最早发挥作用的领域。在阿奎那之前，安瑟尔谟（1033-1109）的本体论证明最为著名，而且托马斯以及笛卡尔的证明方式都受到了他的影响。

托马斯·阿奎那（约 1226-1274），是最伟大的经院哲学家，古代哲学与基督教神学结合的集大成者。

阿奎那的老师大阿尔伯特（1200-1280）为科隆成为中世纪的学术重地付出了第一无二的努力，在阿拉伯译本的基础上，他差不多注解了亚里士多德的所有著作。或许是受到了阿维罗伊的影响，大阿尔伯特也有了将神学与哲学、信仰与自然研究相分离的想法，但他最出色的学生却并不同意他的这一看法。

由于有了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为基础，阿奎那比他的经院哲学前辈们拥有更广阔的哲学视野。阿奎那的出发点是人从根本上可以完全洞察世界。受亚里士多德的影响，阿奎那在其理论中较先前的大多数经院学者们更为重视逻辑，他保存并修改了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他认为神学是由上帝推导出事实，而哲学是以事实推导出上帝，信仰虽不可代替思考，但信仰凌驾于理性之上。阿奎那提出了上帝存在的五个证据，其中一个证明简单概括则是：万物皆有因，所以必然存在最初的因，即为上帝。在共相问题的回答上，阿奎那基本是一个温和的实在论者。

像奥古斯丁一样，阿奎那对众多领域都发表了自己的看法。阿奎那的理论成为天主教长期以来研究哲学的重要根据，被天主教会认为是史上最伟大的神学家。

但有争议的是，在他过世以后，他的有些教导被公开或含蓄地谴责。当他于 1323 年被教廷封圣的时候，他的思想已经完全过时。反而是等到科学时代来临，天主教会才将其作为官方思想家来看待，只不过已不能在一般学术界掀起任何的水花。

## 5. 中世纪晚期的哲学家

阿奎那最重要成就是将神学和哲学融合在一起，但过不了多久，与其相反的观点逐渐占了上风，这些后来的学者未必对阿奎那的神学观点全然否定，但却都提出了一种基本的批评，这种批评延续了阿维罗伊-大阿尔伯特的观点，使得哲学与神学——信仰与理性——之间出现了明显的裂隙，哲学即将脱离神学而独立存在。

这些学者的批评首先被看做是系统性地对主流唯实论提出的批驳。他们认为，任何基督教义与亚里士多德思想结合而生的理论都是失败的；对信仰能被论证这一经院哲学诞生的诱因之一抱持否定的态度；从根本上，对经院哲学的可能性进行否定。

这些反对阿奎那的唯名论学者中，比较重要的有邓斯·司各托 (1265-1308) 和来自奥卡姆的威廉 (约 1280-1347)。司各托在传统的中世纪哲学书写中被认为重要性仅次于阿奎那，而奥卡姆的威廉则通常作为中世纪最后一个重要哲学家出现。奥卡姆的威廉提出的一个理论颇有见地，在近代哲学中起到不小的影响。这就是所谓的“奥卡姆剃刀”：除非有必要，否则，实体或最基础的基质根本没有增加的必要。而且，在他看来，经院哲学本质是一种伪科学，任何一种源自于信仰的知识都不可能为理性所把握。

现在我们可以回头再来评价一下中世纪对共相问题的讨论，实在论的观点，实际上限制了思想家逾越基督教教义——特别是《圣经》的说法——为哲学研

究所划下的界限,而我们今天实际上不难发现理性的方法并不能导出合乎教义的结论。而唯名论以及与之有密切关系的“双重真理观”,使得哲学可以自由地进行探讨,不一定非要达到神学预定的结论不可,同时宗教也暂时脱离了唯理论,可以专注于发展其精神性、神秘性的方面了。

## **6.中世纪学术的回顾**

我们可以看到,中世纪学术的发展与社会经济、政治等“外缘因素”息息相关,但是我们也不能断然同意任何单一因素历史决定论,包括经济决定论,同时学术思想的“内在理路”也不可忽视。中世纪学术的创造性力量主要有两支:阿拉伯世界的学术传统以及拉丁世界的经院哲学,阿拉伯学派的贡献已经在之前有所提及,这里我们主要对经院哲学对于“近代化”过程的积极作用进行简略的分析。

对于信仰者而言,经院哲学的发展至少证明了以理性无法成功为信仰作背书,最好也只能达到托马斯·阿奎那的程度,信仰和理性之间确实有不可逾越的鸿沟。不过在近现代哲学的历史中,我们还会发现理性和信仰也不完全就是水火不相容的,信仰在某种意义上反倒成了理性的“基础”。

有的科学史学者会夸大经院哲学对逻辑学发展的贡献,确实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方法在中世纪的后期得到了经院学者的广泛利用,并成为了大学的必修课程,但他们主要发展的是“三段论”的“古典”逻辑形式,与近代科学有一定关系,但关系不太大。如果我们要做一个譬喻的话,或许我们可以说经院哲学在近代科学的诞生中,起到了脚手架的作用,最后留下的光辉成果,便是理性的方法。如果我们回到文艺复兴学者的看法,这无疑算是对古希腊-罗马古典精神的回归。

### III 近现代